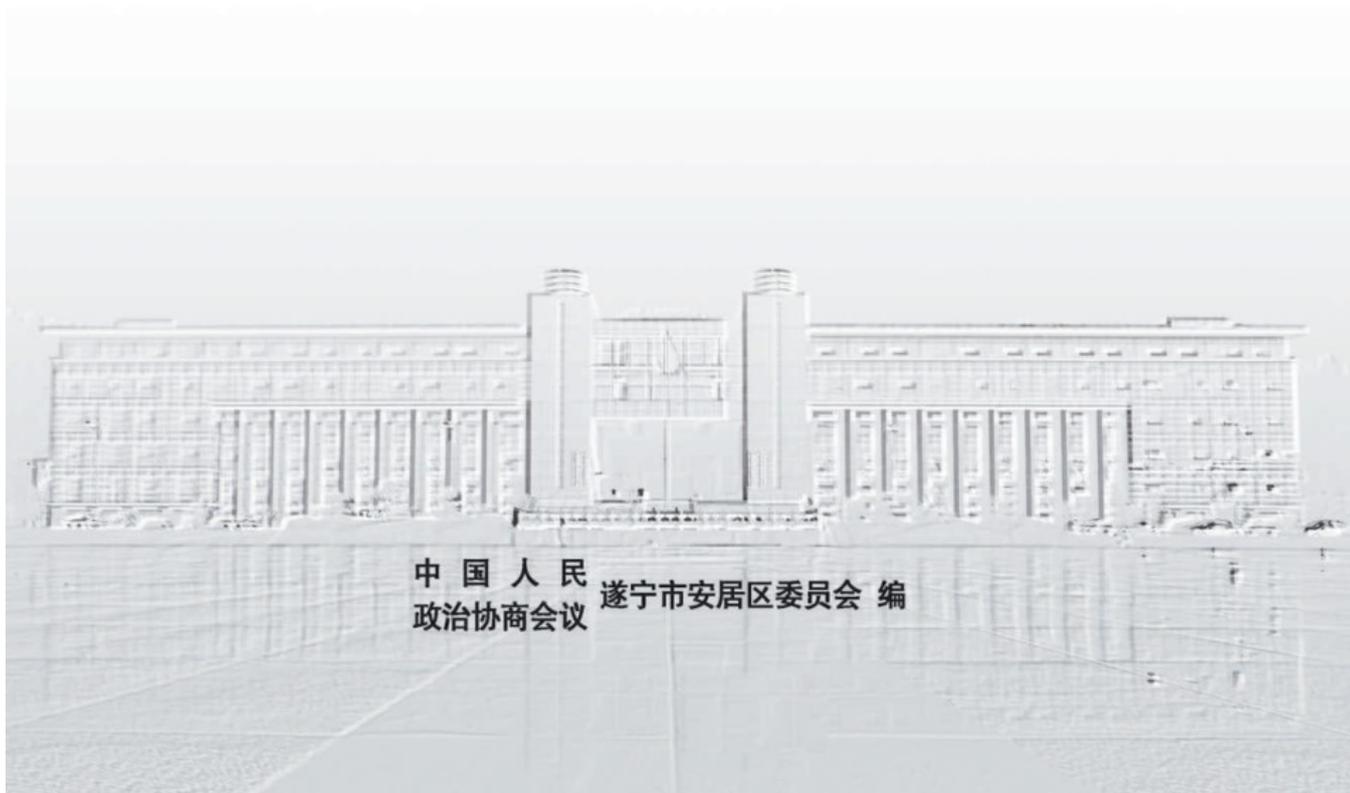


# 安居文史资料

AN JU WEN SHI ZI LIAO

<第八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遂宁市安居区委员会 编

##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

### 回顾当年农转非

“农转非”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已随历史的发展而渐行渐远了，估计将来提到它很多人不知为何物。要说明白“农转非”还得从产生它的根由说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户籍制度是把全国的人口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种，按照这种划分，属“农”者就得努力耕作，无论天旱水涝虫灾风灾，也无论丰收或是欠收，每年都必须交够公粮统购——向属于“非”的城市人提供粮食。那时教育农民的口号是：“天大旱，人大干，多产粮食作贡献。”

而那时对于农民所收获的粮食的分配原则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才是自己的”。所谓“交够国家的”就是完清公粮统购。“公粮”一词人们容易理解，就是农民以粮食交的农业税。而“统购”一词则渐渐为很多人不能了解。所谓“统购”是指农民生产的粮食必需由国家统一收购，其他任何个人或非粮食部门均不得经营，否则就是破坏统购统销的违法行为，是要遭到严厉制裁的。

可是，粮食的生产不是在工厂的车间里进行，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那时科技也不发达，基本是靠天吃饭。而中国又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有的年份农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却因天灾而大幅度减产。这时种粮人也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就出现了“饿着肚子送公粮统购”的现象。

不由得想起《列宁在一九一八》那部电影中列宁告诫富农的那句话：“你们存在一天就得向我们提供粮食，你们敢反抗我们就要镇压。”当然那是对敌人而言。而我们国家对农民则是说服教育，动员卖粮，有时春荒夏荒时节政府也给一定的“返销粮”，让农民度过饥荒。

就因抗灾增大生产成本，减产就减少了收入，而国家收购粮食的数量和价格是早就定死了的，不因减产而少收统购，也不因所产粮食的成本高而提高收购价格，吃亏的就是农民，他们“两头挨棒棒”，低价卖粮给国家，为了吃饱肚子又高价从黑市上去买粮食吃。集体经济也十分薄弱，很多地方一个强劳动力干一天才挣八分钱。所以谁都怕当农民，于是“农转非”“脱农皮”“跳龙（农）门”“脱掉草鞋穿皮鞋”就成了农村人梦寐以求的、终生追求的、甚至是辈辈代代奋斗的

目标。这就是产生“农转非”的历史背景。我作为生长在农村的孩子我深知其中的缘由。

我一生也经历了三次“农转非”。

第一次是我考上了初中，凭录取通知书到粮站卖粮，然后粮站再给我一张转粮单，我再凭录取通知书和转粮单去到户籍管理部门转户口，即把农村户口转到三家中学去，实现了我的“农转非”美梦。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高中，户口的迁移就简单了，只把三家中学的户口转到遂宁中学去就是，不必再卖什么口粮——这就属于“非”转“非”吧。

可是1962年上级规定所有农村学生的户口全部转回农村。农村学生的口粮也就不再由国家供应而是回生产队去分粮——实际上就来了个“非”转“农”。

这一变故反而激励了很多农民子弟奋发努力，要争取考上大学，再来一次“农转非”。而我则命运多舛，我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就回乡当农民了。但我却固执地做着“农转非”的美梦，一天也没有放弃吃皇粮的希望。

1965年我当了民办教师，从此走上了教育战线，也为我再次“农转非”奠定了基础。

八十年代初，我因参加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的“民转公”考试，我榜上有名，考上了公办教师，又获得了一次“农转非”的机会。

因属于公平公正公开的正常途径的“民转公”所以手续也就简单，拿上县级有关部门颁发的录用通知，去粮站转粮，到派出所转户口即可。

可家中妻子儿女还是农村人，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半边农”。相反，夫妻二人都是吃供应有工作的家庭通常称为“双职工”。这“半边农”日子难过，成年累月劳累不说，种田人的口粮还得不到保障，并且子女也是农村户口，长大又面临读书升学就业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半边农”们想尽千方百计都要想“农转非”，让家庭成员全部变成非农业人口。

当年“农转非”的指标控制很严，一般“半边农”是望尘莫及的。我家属的“农转非”是在我民转公后的第十一年——1991年才争取到指标的。其办理程序是：个人申请，层层审核，最后有关部门再审定。

个人申请往往都要说些自己家庭不宜在农村居住的理由，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老婆得了什么什么病，失去了干农活的能力。既是，家属有病，那么即使在其它

方面都合格的时候也还有最重要的一关——体检，其目的是检查申请人的家属所患的病是否属实。属实才能农转非，否则就不行。

记得是 1991 年下半年的一天，上级通知我家属于某天带上相关手续去遂宁南门南豪宾馆集中。当时我们三家办事处也还有另外两家接到了通知。虽没明说，但都知道是叫家属参加体检。本来是不让家属的男人参加的，但家属们多是农村妇女，很少出过门。男人们都不放心，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送家属进城，去了指定的宾馆。

可惜当天晚上就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并且是风雨交加，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那时物质还不很丰富，加之始料未及，所以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没带足够多的御寒衣物，很多人冷得瑟瑟发抖。

不一会召集人通知家属到指定房间开会，男家属都不准参加。会上主要讲些注意事项，强调体检中的纪律，然后散会回房间各自准备。然而大家最最关心明天去哪里体检的问题却没透露一丝一毫！

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环节。因为有的家属其实根本没病，或者病情不严重。往年体检中就有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买通医生，请求医生开恩做假，出具受检者病情严重的体检报告。

为杜绝营私舞弊，所以当晚只告诉大家：体检地点明天临时决定。

因天太冷，大家心情又相当复杂，所以当晚无论哪家的男人女人都各自早早地钻进了被窝，只等明日听候发落。

次日天刚麻麻亮，组织者就到宾馆来了，把大家催起床后就集合点名。人到齐了就统一上车。这时的男人们都忐忑不安地送自己的家属上车，很多男人把自己的衣服脱下让老婆穿暖和——这时的男人们都顾不上自己了。

车队的去向高度保密，尽管很多男人想跟踪，结果都落空了。车队先是一溜烟开上了涪江一桥，大家这才猜测是去南充体检。有背景的人士就纷纷向南充那头的关系户打电话——那时手机还没普及，多是找座机打的。请求那头关照。

其实不然，很多男人直等到两天后女人们体检回来后才弄清楚是在内江体检的。原来有关方面为甩掉跟踪者，故意声东击西，先开车往涪江一桥开，造成去南充的假象。见成功甩掉了跟踪者之后才掉头绕回遂宁城区，直奔内江而去。

据说很多人都懂得搞假，比如申请上写了患有肾炎的，在查小便时就将自己

的手指头刺出一点点血，再滴进送检的尿液里——造成肾炎严重，已有血尿的假象。

结果那次有很多人没能过关，而我的家属也未批准，农转非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

1993年我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按当时的政策，我享受了省级优秀教师的待遇，全家才得以农转非。

于是第一要务是卖口粮，转户口。我们虽然辛辛苦苦地挑粮去粮站卖，但心里却是十分的骄傲和自豪。然后是向队里声明退包产地，从此不再交“双提款”，不再干农活，成了正儿八经吃皇粮的城市人。

九十年代初，我们全家开始吃供应粮了，那时候国家供应粮的售价比自由市场的粮价要稍低一点，所以吃供应还有一点优越性。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粮食和其它物质一样很快丰富起来，想买粮就到自由市场上随便买，供应粮也就失去了它的价格优势，直到后来也就完全不需要国家供应，吃皇粮的城市人也和农村进城的人一样随行就市买粮吃了。

在中国，非农业人口吃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供应粮，这现象终于结束了，农转非一词可能只存在于将来中国的史书或人们的回忆录中——这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邓正洪 全文 3000 字）

## 人与土地的不了情缘

### 序语

改革开放至今已四十年，这四十多年里遂宁和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最先最直接感受到的深刻变化是土地下放到户，使耕者有其田——哪怕仅仅是承包权农民也很满足。于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井喷似迸发，粮食产量迅速提高，物质迅速丰富，市场也迅速繁荣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丰衣足食的日子到来了，历史上缺吃少穿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可始料不及的是四十年后的如今，遂宁农村也出现了土地撂荒现象，农村人

口大量流失，并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有房无人的“空壳村”还在逐年增加，此现象真值得深究。

本来，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并且不可再生，它于人之重要仅次于日光空气水这三要素——因为除了日光空气水之外人就需要粮食，而粮食又得从土地里生产出来。

因此为获取赖以生存的土地，历史上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曾发生过数不胜数的流血冲突，很多很多的人为之伤残甚至丢命。

英国十三至十六世纪的圈地运动就是为了土地。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农民战争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土地。

中国自古是以农耕为主的国家，百姓视土地为命根。曾听说有漂泊海外的人，走时都要带上家乡的一捧土以慰乡愁。之后无论他有多成功，有多富有，多年后他们都希望落叶归根，可见游子对故土的牵挂和依恋。

人们或努力挣钱，再积钱买地，再传给后人，如《增广贤文》中所说：但存方寸土，留予子孙耕。

也有一些权贵，巧取豪夺兼并土地，造成土地高度集中甚至垄断，至很多耕者无其田，耕者要活命，只好起义，从富人那里夺取土地。东汉末年，张角创立太平道，主张“均贫富”。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均贫富”的人。宋代四川的王小波起义，李顺起义，其口号就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他们要“均”的是什么？那个时代当然主要就是“均”土地。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立的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也是为了均土地，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都是以此号召民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所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亦称土地革命战争。当时的政策是：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毛主席在诗中就有记叙：“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及至解放战争，解放军解放了哪里，就在那里建立新政权，并进行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土改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阶级，把封建剥

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种改革，算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以上都是学习历史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而从笔者亲身经历感觉到，遂宁的农民对土地的态度经历着如下几种转变：

### 一、 土地改革时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一九五〇年遂宁解放了，那时笔者还是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屁孩，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不忘。土改工作队来了，村里的农协会成立了，秧歌成立了，人们跟着秧歌队学会了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我也成天欢天喜地跟着叔叔嬢嬢们疯跑，欢唱，跟着土改工作队喊口号扭秧歌。还学会了唱：《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歌曰：

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  
哎嗨哟到了每个村，  
咱们大家翻了身，  
唱起了歌儿遍街走呀，  
再不是愁眉苦脸的人啦。  
呀乎哟乎呀火嘿，  
呀乎哟乎呀火嘿。

那时白天唱，晚上唱，特别是开大会斗地主时唱得更欢，最投入。

还有一件最刺激的事就是看“敲沙罐”。所谓“敲沙罐”就是枪毙大地主、大恶霸。那时枪毙犯人通兴用枪弹直接击碎脑袋，所以谓之“敲沙罐”。我们小孩嘲弄地主家的孩子，就疯唱：

地主地主，ri 你屁股，你不干，敲你沙罐。

当年，土改工作队队长就可批准杀一个人，犯人的罪行一般是曾经有劣迹，有民愤，现在又反对或者破坏土地改革。大坡乡先后就枪毙了几个大地主。每逢要枪毙人，我就跟着大人去看闹热。

当时我家分到了伪乡长邓谦若大院里的一间房子。一天早晨，我被邓谦若家人的哭声惊醒了。跑去一看，才知是邓谦若上吊自杀了。因为在此之前枪毙其大地主时曾把他弄去“陪杀场”，可能他自知在劫难逃，就早早自行了断了。

后来我发萌读书了，记得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第一课是“人，一个人。”

第二课就是“手，两只手。”第三课就是“一个人有两只手。”若干课之后就有这么一课：《学生要爱书和笔》。课文内容是：

工人爱机器，  
农民爱土地，  
战士最爱枪和炮，  
学生要爱书和笔。

教材突显了土地于农民是多么珍贵的。

那时农村到处是一片翻身得解放的欢乐气象，农民们扬眉吐气，神采飞扬，斗地主口号喊得震天响，分土地欢天喜地格外忙。

土改时有一首歌叫《老黄牛》，道出了农民的喜悦心情。歌词是：

老黄牛呀肥又大，  
土改以后到我家，  
一家大小都爱它。  
哥哥给它割青草，  
嫂嫂给它拌豆渣，  
弟弟给它沏饮水，  
嘿——  
我就给它戴上一朵大红花。

我成天跟在大人屁股后面蹦蹦跳跳，很快也学会了《老黄牛》这首歌。

分得土地的农民心情格外舒畅，捧着盖有大红公章的《土地证》有的高兴得笑，有的激动得流泪。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收获的劳动果实自己享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然十分高涨。

当时，有的地方还有少数残余的土匪，遂宁县大安区（现大安乡）还发生过土匪劫场，打死解放军邢指导员的恶性事件。人民政府告诉人民防止地主阶级“反攻倒算”“秋后算账”，则以“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发动群众与敌对势力斗争。所谓“胜利果实”主要也就是土地。

那时很多城市居民原本都是农民，因躲债或者躲拉壮丁等种种原因才跑到城里去谋生的。一听说乡下在搞土改，他们又纷纷跑回原籍去分田地，去享受胜利果实。

及至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家也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护胜利果实”这类口号动员人民积极参与。

## 二、大集体生产时农民对土地的淡漠

一九五一年老解放区沈阳郊区高坎村农民张振发响应党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组建了第一个生产互助组。一九五二年一月，张振发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办起了沈阳市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高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转眼到了一九五五年，遂宁和全国一样各地纷纷建立起农业合作社，农民把一切生产资料入社。所谓“生产资料”不外乎土地、耕牛、农具等等，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土地。入社之后的土地就是农业合作社的了，农民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全都没有了。

开始叫初级农业合作社，五六年，五七年又逐渐把初级农业合作社——即小社并为大社，称之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在“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思潮推动下，一九五八年遂宁和全国一样普遍成立起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个乡为一个公社。

当时大力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优越性：农民一下子全部变身为“公社社员”，土地属公社所有，农民在公社的土地上干活，在公共食堂吃饭，劳动无报酬，吃饭不要钱。

一九五八年我正好考上了初中，一次回家才知道生产队建立了集体食堂，禁止私人在家开锅煮饭，我们就和家长到集体伙食团吃饭。当时人们很感新奇，很感幸福和自豪，因为宣传说几千年没解决好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一下子就解决了。还有这样的口号：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

可事情的发展总有些出人意料，土地是公社的，种什么，何时种都听上面的统一指挥。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出现了。干部开会批评说：有的人，“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屙屎要屙两点钟”。

接着就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再现了“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一九六〇年的春荒和这场春荒给党和人民带来的重大灾难：

大饥荒袭来，李家寨朴实的农民还以为这几天大风雪，把电线杆吹断了，乡

亲们的情况反映不到北京去，等风雪小了，电线杆竖起来，电话通了，中央知道后就会来救我们。

当李家寨的 490 多口人面临着被饿死的局面时，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铜钟迫于无奈，只得求老战友、粮站主任朱老庆开仓借粮。他说：“我要的不是粮食，那是党疼爱人民的心胸，是党跟咱鱼水难分的深情，是党老老实实，不吹不骗的传统……”朱老庆开始不敢答应，这明摆着是违法犯罪的勾当。但面对老战友，面对饥民，他冒险同意了。

借粮成功，群众免于饿死，李铜钟却成了“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朱老庆成了同案犯。当县公安局来抓人时，群众不依，李铜钟劝群众让开道，别妨碍公安干警执行公务。然后“平静甚至是友好地自投法网了”。

他被带走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大队会计：要照顾好老人和孩子，种子得留够，不要误了春播。在审讯时，李铜钟的第一句供词是“田政委，救救农民吧！”第二句供词也是最后一句：“田政委，快去卧龙坡车站，快，快。”——李铜钟临死还惦记着车站里聚集的几个村子就要外出讨饭的村民。

李铜钟因“过度饥饿和劳累引起严重水肿和黄疸性肝炎”倒在了审判庭上，连死都没有摆脱“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的罪名，可群众却特别敬慕这个戴着镣铐的冤魂。

该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共产党员李铜钟这一英雄形象。他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英雄，而且也是特殊历史环境所造就的特殊英雄。人们由衷地敬佩他，视为当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盗取了天火，拯救了众生，牺牲了自己。

十多年后李铜钟案得以平反，清明节那天，新任地委书记——原县委书记田振山去祭扫李铜钟墓，向冤魂传达平反喜讯。他在心底呼喊：“记住这历史的一课吧！战胜敌人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战胜自己的谬误也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活着的人们啊，争取用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智慧吧！”

同样，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致信毛主席，说江苏昆山县的一个贫农对前去调查的姚依林说：“请你给毛主席带个信，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不然实在吃不饱，没劲干活。”

张一弓写的是河南的事，李先念反映的是江苏的事。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四川遂宁时时也有饥饿的事儿发生。都反映出一个问题：不好好耕种土地就要挨饿。

一九六一年后中央迅速采取措施，调整国民经济，农村的人民公社的框架仍然存在，但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单位——实际上就是把土地的经营权下放到生产队。

土地“下放”到队里了，集体伙食团也随之解散了，种好种歪，收多收少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因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

当年化肥的使用尚少，种地全靠农家肥，于是动员农民养猪，再后来曾提倡一人一猪，一亩一猪。但猪饲料不能都是生产队种，为了方便农民种菜吃和自种饲料养猪，一九六二年后又开始分一点地给农民作“自留地”。

开始划自留地时人均只允许给五厘，后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也才增加到人均七厘，这样农民又一次拥有了一点点土地。虽然很少，虽然仅仅只有经营权，但总算可以自主了，农民就把能够用上的精力（劳动劲头）、物力（粪肥）用在了那点点自留地上，把自留地经营得有声有色。所以有人还歌颂自留地说：

花满藤藤瓜满架，  
自留地里遍开花。  
要想打顿素牙祭，  
又推豆腐又煎粑。

——因为自合作化以来，政府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粮食和肥猪由国家统购，只能由国家经营，私宰肥猪是违法行为。所以想改善生活要吃肉不容易，只能“打顿素牙祭”吃点豆腐和油粑而已。

社员热衷于自留地，就懈怠了集体土地。当时遂宁农村又流传这样的话：

“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  
“你出工，我出工，生产队里磨洋工。”  
“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  
“大田生产养精神，自留地里打冲锋。”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队开社员大会时，队长批评有的社员：“早上转，中午转，下午也去转，每天自留地里转三转。”

长此下去，终至大田生产产量低，社员收入少。秋后结算时有的队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仅八分钱，只够买一包“春耕烟”。队里大部分农户都成了超支户——反而要倒补钱给生产队才能取回自己那份口粮。社员又有意见了，所以又有民

谣曰：

辛辛苦苦干一年，  
结果还要倒补钱，  
你补钱，我补钱，  
大家都补钱。

农民没法从队里要钱，而干部们却容易。于是就有这样的说法：

队长用钱嘴巴一啫（张）。  
出纳用钱皮包一拉。  
会计用钱笔下生花。  
社员用钱喊爹喊妈。

所以很多农民对集体生产越来越没兴趣，对集体土地越来越淡漠，只盼望能分田到户，自己耕种，自己收获，自己享受。但政策不允许。自上而下层层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倾向。所谓“三自”就是：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一包”就是：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就是：土地租佃自由，土地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被斥之为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

农民对集体土地的越淡漠，造成产量越低，社员生活困难，于是对集体生产更加消极，终至恶性循环。粮食产量低，中国人口多，饭不够吃咋个办，就强调首先要完成国家的，集体的。

在所产粮食的分配上上级提出这样的分配原则：

送够国家的，（公粮、统购）  
留足集体的，（种子、公猪耕牛的饲料）  
剩下才是自己的。（社员的口粮）

若遇天灾，大田欠收，除去国家的集体的之外，粮食所剩无几，社员生活更困难。再困难也得听干部的话，干部又只听上级干部的话，农民没有话语权，喊送公粮就送公粮。无论何人，拒送公粮统购那就是违法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我记得原苏联的一部电影《列宁在 1918》，其中有一句台词最经典。富农不愿交出粮食，列宁对富农说：“你们存在一天就得向我们提供粮食，你们要反抗

我们就要镇压！”

有的干部也聪明，担心农民有抵触情绪，就把送公粮统购的工分定得高高的，农民为多挣工分还争着把谷子送往粮站。

除去锅粑饭就少了，为了吃饱，农民只好在自留地里打主意，更加精心经营，多种蔬菜以掺饭。可是每人仅七厘自留地，能挖掘出多大的潜力呢？

队里开会就用语录教育社员：农忙吃干，农闲吃稀，半忙半闲，半干半稀，杂以蔬菜瓜果……

而我们学校的老师，文革时吃饭前要集合立正，背诵毛主席语录，首选就是这两条：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节约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

——背这两条语录，以警醒大家要提倡节约，杜绝浪费。

一九六〇年，饥荒越来越严重，供应量越来越少。当时遂宁曾有人发明“粮食增量法”，就是把谷子先蒸熟再烤干去壳成米。这样加工少刮去米皮，米粒大颗，据说煮饭涨分大，虽不好吃，但量多抵饿，民间俗称之为“火炕米”。那时我正在三家中学读初二，为了能吃饱一点，我和同学们还乐于吃“火烤米”呢。

当时三家供销社还搞过“代食品”的示范展览。将胡豆叶和丢弃的苕根及油枯，甚至梭草脑壳（草根）制成糕点让人品尝，然后叫大家推广。

但，无论“火烤米”也好，“代食品”也好，结果都是虎头尾，昙花一现就消失了，并未对局势的扭转有任何实质的补益。

### 三、改革开放初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生活紧张，农民靠那点点自留地终究解决不了大问题，于是就盼包产到户。可谁敢为天下先？谁敢冒险提出分田到户呢？

直到1978年11月，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18位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一份承包责任制的文书上按了鲜红的手印，从此，中国农村开始了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性变革。

遂宁正式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那些年，我正在本村小学教民小。最先队里是把田边地角，零星小块的劣质土地分一点给农民。即使这样农民也很高兴。后来有的地方又搞成“水统旱包”——水田仍然由集体统一种，只把土包产到户

——上级考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粮统购（谷子）按计划入库。

我们遂宁地区直到一九八〇年才全面落实包产到户。

土地要分到户，农民十分高兴，可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其一、开始按人头分的“口粮田”比例很小，按劳动力分的比例大，因此劳力强的农户地就分得多，产的粮食多，吃不完。而有的农户劳力弱，可小孩多，吃饭人口多，地又分得少粮食仍然不够吃。

其二、地块的土质肥瘦，大小（小块地耕种费力），离家远近，向阳与否都在农户的考虑之中。

其三、有的“遗老”诸如“老土改”“老干部”“现任干部”等一下适应不了，他们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认为分田到户是开历史的倒车，是搞修正主义。对包产到户持抵制态度。

而社员们说他们中很多人因大集体时在当官，在搞管理——单就生产队一级而言就有正副队长、出纳、会计、保管、记分员等等“官员”，他们一些时候到处开会，回来又开会传达，又布置，之后又到处检查等等，指手划脚的多，实地干活的少，“大集体的福享受惯了”，“自来食”吃惯了，怕劳动，怕亲自下田种地。他们是大集体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想改革，生怕改革，想继续骑在社员头上过“寄生生活”。什么“一夜回到解放前”，“开历史的倒车，是搞修正主义”等等言论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托词，是反对包产到户的遮羞布。

这些人企图维持大集体生产的现状。因此就出现了“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根抵门杠”的暂时现象。

但一年以后土地都按人头分配了，地多地少的矛盾解决了。而其它矛盾也通过干部做工作，适当作调整也逐步得到解决。而少数“遗老”们眼看这是历史潮流，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无可奈何花落去，也就莫法再抵触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包产到户了，第二次土地还家就如浩荡的春风给农村带来了生机，生产力彻底得到了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热核反应般迸发出来。他们纷纷添制农具，购买良种，发展养猪以蓄积肥料，又没日没夜地精耕细作，出工不用催，收工喊不回，他们虔诚敬业地待弄着这来之不易的包产地。

就连我们这批“半边农”（妻子儿女是农业人口的公教职人员），星期天、节

假日等都立即投入到包产地的耕作中去。特别的农忙季节我们都要在包产里亡命地劳动，忙着春耕夏锄和秋收。更特别的是栽秧的季节，我们成天坐在办公室忧心忡忡谈天气，生怕遭遇倒春寒——那么下田栽秧就比冬天还冷呢。

有投入就有产出，农民付出的辛劳必然收获丰硕的回报。产量迅速提高，粮食迅速增加，余粮的转化使肉类蛋类等副食也一下子丰富起来，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各种供应随之取消，票证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坑。吃皇粮的城市户口再也没有了优越性，没有了诱惑力。

（特别是现在，农民有种粮补贴，高龄补贴，残疾补贴，五保、低保，有宅基地又可自行建房，无钱农户国家还给建房补贴等等优惠，所以有的城里人想“非转农”回农村去。当然这是后话。）

土地下户引起了若干变革。瞎指挥没有了，亩均投入的冤枉劳力没有了，剩余劳力增多了。良种良法的推广，引起了耕作制度的一系列变革：不再精耕细作，只宜粗放耕作，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力更多，于是很多农村剩余劳力就向二三产业转移，又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

#### 四、而今农民对土地的再淡漠

农民不再把致富的目光局限在那一亩三分地里，他们要发大财，大发财，于是就纷纷外出打工，南赴深圳广州，北漂京津冀，西去西藏新疆，东跑上海江浙，甚至漂泊海外。

一些打工仔，通过几年十几年的历练，打工致富了，变成小老板甚至大老板，于是衣锦还乡，令乡亲们刮目相看。

一些外出打工者的成功，对乡亲们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对农民也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加之农业成本的越来越高，增产潜力越来越小，农民纯收入相对渐少。农民认为“在家种田，不如外出挣钱”，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不再安于在老家抱残守缺，都纷纷外出打工，寻求致富的捷径。

以至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土地的态度产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渴求到淡漠，由精心伺候转而丢弃撂荒。

一些地方撂荒现象还十分严重，原本是良田美地，撂荒几年十几年之后荒草齐肩，野树成林，野物乱窜，鸟害成灾。

而鸟对庄稼的危害是全过程的——从刨食农民种下的种子，到啄食农作物嫩

芽，啄食未成熟的庄稼，直到糟踏成熟的粮食。人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农民为了自身的近期利益就对鸟儿开了杀戒，诸如种子拌毒，播种期间遍地投撒拌了农药的粮食，引诱鸟儿觅食，或遍张鸟网等等等等，完全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开始，农村的年轻人走了，留下一些老弱、妇女和儿童，人们戏称之为“993861”部队。随之就出现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一群体，相应也就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但“99”和“38”这部分人仍然坚持着耕种自己的包产地，撂荒现象还不很严重。

后来有的孩子随打工父母去外地读书，有的孩子在本场镇就读，留守在家的老人又上街（租房或买房）陪孙子女读书，由是原有的“99”“61”部分离去，就只剩下“38”这一部分了，她们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更穷于应付，所以很多农妇也夫唱妻随，双双外出打工，使土地撂荒现象更严重。

很多修得漂漂亮亮的楼房就闲置起来，很多院子有房无人，因此而成为“空壳村”。一个大院或几个大院只剩下几个老弱病残，深更半夜偶闻一两声狗叫鸟鸣都甚感恐怖。难怪有人这样调侃：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夜来风雨声，  
老人好恐怖。

又曰：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抬头问明月：  
儿孙在何方？

现在如果我们乘车去区乡，甚至乘火车去外地旅游，我们都会发现一些路段就在铁路公路两旁都有一些撂荒地，还一片连一片，颇具规模。那么远离铁路公路，交通不便的偏远村社耕地撂荒现象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国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给了农村很多的优惠政策反哺农业，例如不再收“双提”款，完全免

除农业税，还倒给种粮直补，给退耕还林补贴，给老人补贴，给残疾人补贴，对农村孤寡老人实行“五保”等等，可是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土地撂荒现象仍然存在，并还可能有发展蔓延的趋势。

遂宁如此，很多农村也如此。据河南省南召县委学校张红强著文称：“尤其是近几年，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过快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出现的撂荒现象也在日益加剧，据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 3000 万亩。”真是触目惊心。

据说连“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此都十分担心，担心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但是，谁能说农民又不爱自己的包产地呢？谁要是侵佔了他的包产地，哪怕是一点他也是坚决不答应的。即使撂荒，也是他的地。近几年农村大搞交通建设，普遍修水泥村道，社道，直通到农民家门口。农民感到很方便，很舒服，他们说：从此下雨天赶场都不湿脚，不需买水靴了。

但在修路时佔他一点点包产地都不行，甚至掉换一点都不行。结果只好修改原计划，水泥路又得绕道走，造成人工材料的浪费和成本的增加——这时他视包产地又如命一般重要。

## 五、仍有例外

而今又有一个现象与上述现象截然相反：很多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无论他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多富有，也无论他曾经当过多大的官，他们却都十分留恋土地。

一是全家“农转非”这一类人。这批人自“农转非”起就失去了土地，每日三餐粮食蔬菜都靠买，既花钱又不方便，并且更担心食物的农药残留。他们很不习惯，总想能有一点可耕种的地自种自吃。因此又十分留恋起土地来——我家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例。

我是在 1993 年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的，因此得到了奖励指标，全家才得以“农转非”的。我们家住七楼，属顶楼。我和老伴就发挥愚公精神——背土造地。我们去郊区要来泥巴，一天又一天锲而不舍地往楼顶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造成了一点点“菜地”。我们又买来大塑料桶作“泡青池”，把部分生活垃圾沤成青肥适时浇灌。“地”里种上茼蒿蒜苗茼笋及各种瓜类等等，既美化了楼顶，吃起来又方便。有时还自给有余，就送点给邻里分享。这些菜无农药及化肥残留，

真是绿色环保食品。

还有一些非顶楼住户，只好利害阳台和防护栏，“盆栽”各种茼蒿香菜等。

另有一些人，他们原本也是农村人，后因参加了工作离开了农村，而家人全都在农村，这些人的根在农村，一退休后就回到农村老家重操旧业躬耕垄亩。他们拿着不菲的退休金，多少种着点地，饲养点牲畜。在老宅基地上建起小别墅似的小洋楼，水电气全通，宽带安了，太阳能热水器安了，家用电器应有尽有。水泥公路直通到家门口，想出行约个车，既方便又快捷。他们眷恋着土地，经营着土地，过着新时期现代的田园生活，日子过得比小康还小康。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而有的人原本是农村人，因农转非或者其它种种原因家人全都成了城镇居民，农村没有了家，退休后闲不惯，就去城边或者场镇周围“捡”一些撂荒地种。

遂宁市安居区三家中学就有这么一批退休教师，至今他们不愿进城，不愿随儿女生活，却在学校周围“捡”地种。有的老师“捡”的地还不少，不但栽种各种蔬菜，还种花生芝麻油菜等油料作物，有些年份还种水稻，甚至还养少许鸡鸭。他们说劳动量可自行掌控，以不累为度，就当活动筋骨，锻炼身体。

他们很自豪：我们自力更生改善生活，我们绿色环保拒绝农药化肥。我们菜不买，油不买（自己现榨），米不买。要吃菜现去土里摘，烧起锅儿等都来得及。更有一种“采薇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情画意。

甚至，他们中有的老师嗜酒，就自买器具自酿酒。他们说遇上天气好，心情好大家邀在一起，“斗地主”，喝小酒，聊天下大事和菜地里的小事。恰如孟浩然诗意：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一次偶遇同事奉泽民——原栏江镇文教办主任。交谈之中得知他所买住房就在遂宁的西山路，他向当地人要了两分多地来种。他自豪地说每年黄豆包谷吃不完，红苕够吃好几个月。

以上这些人等，完全陶醉在现代的农耕生活中——堪称是对土地的“不了情结”吧。

当然，这部分对土地有着眷恋情结的人与全国农民的总人数比堪称沧海之滴吧，他们钟情于土地，躬耕垄亩只改变了他们自身的生活，于全国的大局无补。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已采取了很多措施，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力图解决“三农问题”，但老问题解决了，又出现若干新的问题，使耕者仍不乐于耕，撂荒现象仍在继续。那么如何彻底有效地改变土地撂荒现象，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最终使耕者乐耕，非耕者也乐耕，使农村真正的繁荣起来，这就成了决策部门应着力研究的新时期的重大课题。

（邓正洪 全文 10400 字）

## 三代人与改革开放的故事

### 一、爷爷那一代的故事

那年，似乎没发生什么太大的事情，我的爷爷还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的父亲还是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屁孩，而我还没有出生。

我的爷爷耕作于土地之上，靠着土地微薄的出产维持着一家大小的生活。那个时候，他们做饭就是一小撮米加一大锅水，幼儿还好，他们吃的饭是跳米饭，也就是把碗放到锅里一起煮，煮饭时跳进碗里的米往往是最多的，而其他则就着泡菜喝着米汤用筷子刨两下米。

那个年代，衣服还是需要布和裁缝才能弄出来的东西，而爷爷作为一个贫穷的乡下农民，依旧穿着单薄的夹衣，在夏天还好，但是在冬天，潮湿的气候让爷爷的骨头都快冻僵了，于是很快地，爷爷就病倒了。

在勉强能够抵挡住风雨的木瓦房子里，一家人看着风从漏出了稻草的破篾巴墙的洞里使劲地灌，于是又给躺在床上处于病痛中的爷爷搬来了几样比较值钱东西之一：被子，然后小心翼翼地给他掖好被子。

那个时候，家里是没有交通工具的。在当时大名鼎鼎的凤凰牌自行车就如同真正的凤凰一样难以见到，人们都叫它“西洋镜”或者是“洋马儿”。于是年幼的父亲不知走了多少里山路，然后找来赤脚行医为爷爷看病。可是最后，治病治了七年的爷爷还是没有挺过去，1985年，爷爷没有跟我打招呼，离开这个世界到马克思那儿去了。

那些年，是1978年至1987年。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

那时，还发生了很多的事。

1979年，设立经济特区。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那是，爷爷那一代人的故事。

## 二、父亲那一代的故事

那年，似乎发生了很多的事，但是对于家里来说，只是几个孩子长大了，开始准备成家立业了，那是一个灰暗但逐渐能够看见光明的年代。

我的父亲在那一年高中毕业，开始走上社会，但是在没毕业之前，他还是得走40多里路去上学。虽然家里的状况逐渐好转，但是仍旧无法承担起更多的支出。父亲往往会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就起床，穿好家里十分珍惜的毛衣毛裤和洗得发白的衣服，借着微弱的晨光和烛火，做好掺杂了少数花生米的稀饭，准备好家里人中午做饭用的零星肥肉和蔬菜，背上上带在路上和学校里吃的红苕的大米，看了眼经过一番修整后总算是能够遮风挡雨的石木青瓦房后，父亲走上了崎岖的山路。

那40里也不全是崎岖的山路，还有很长一截平整过后通车的土公路。那时候，为了节省在路上的时间，父亲和同学会在走到通车的路上时，看准时机跑到一辆路过的货车或者拖拉机边上，扒住车子赶一趟不常有的顺风车。于是在一次回家的途中，父亲没能扒住车，摔了头破血流，很幸运的是，有路人把昏迷过去、满脸是血的他救起，送到了年老的乡村医生家里。

那些年，是1987年至1998年。

1987年10月25日，十三大在北京召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正式开启。

那时，还发生了更多的事。

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3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财税体制改革；1997年，“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那是，父亲这一代人年轻时的故事。

## 三、我这一代的故事

那年直到现在，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对于我们家来说，也是意义非凡，我这一代人，随着国家一起成长，看着我的国，心中自豪地坚信着，这是我们的时代！

我是出生于 1997 年的早产儿，那个年代，早产往往就意味着早夭。在父母的坚持下，我的幼儿时期就这么在医院里过去了，随着情况逐渐稳定，我总算是离开了医院，开始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

于是，我用着我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日新月异。

衣服不再是单薄的夹衣和珍贵的毛衣，也不用在商场中挑选，现在我们可以随意地在网络上自由浏览下达订单，自然会有精美保暖的衣服送上门。

食物不再是清澈的稀饭和冷硬的干粮，也不用在餐馆前纠结，现在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尝遍天下美食，大家的口头禅也从“吃了吗？”开始往网络语言发展。

住房不再是漏风的土房和狭窄的石楼，也不用再担心炎热和寒冷，现在我们可以打开空调或者暖气，住在自己的屋子里和家人一起玩耍。

出行不再是疲劳的双腿和危险的扒车，也不用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现在我们可以滴滴打车，也可以坐高铁，我们的世界不再因为距离而遥远。

还有很多很多，从民生到经济，从法律到外交，从军事到科技，中国一直在不断成长，我们的国家一直在强大。

那些年，是 1998 年直到现在。

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是因为我们太弱小；中国南海撞击事件，亦是因为我们太弱小；中国银河号被扣押检查，还是因为我们太弱小。

可是现在啊，我们不再弱小了。改革开放创造了奇迹，让中华民族在遥远的东方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1999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2001 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03 年，中国击败非典，杨利伟成功飞天；2008 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2011 年，中国新一代隐形无人机歼 20 试飞成功；2012 年，辽宁舰正式入列海军，中国从此拥有了航母；2013 年，神舟十号飞天；2015 年，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 年，G20 峰会在杭州召开；2017 年，中共十九大顺利举行。2018 年，我们迈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未来，我们的下一代，又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的国，又将如何呢？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梦！

作者：卢恒宇

### 上世纪一次特大旱灾

一九七九年，遂宁县遭遇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栏江、白马、东禅几个区是旱情最严重的地区。当时我在栏江粮站工作，亲身经历了这次大旱，参与了抗旱救灾和灾后的救济工作。

从一九七八年的九月到一九七九年七月，近一年时间，未下一次透雨，几次零星小雨降雨总量仅三百多毫米，为正常年的百分之五十四，是有气象资料记载以来最少的一年。一九七九年五、六两个月仅降雨七十四毫米，为正常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一，七月上旬没有降雨。这种情况，在遂宁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当年的老年人说“一年四季干，没有从来没听说过更没见过见过，民国二十六年大旱，但只干了田，土都没干，今年是田土一起干”。

特大干旱带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根据遂宁县遂委发 79（85）文件，在七月对全县粮食产量进行的预测统计，全县七九年水稻总产量八千五百万斤，比上年二亿七千二百万斤减产一亿八千五百万斤，减产百分之六十八；春玉米总产二千万斤，比上年六千万斤减产四千万斤，减产百分之七十八；如果七月中旬能下雨，红苕能补栽增栽，总产能达到一亿八千二百万斤，比去年减产百分之二十；棉花主产区旱情最严重，棉花基本干死，芝麻花生基本无收。大春粮食总产二亿九千七百万斤，比上年大春粮食总产五亿六千七百万斤减少二亿七千万斤，减产百分之四十七。

旱灾给人们生活和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全县人均口粮二百八十斤，比上年四百五十七斤，减少了一百七十七斤，特别是栏江东禅白马横山等重灾区缺粮状况更加严重，全县农村缺粮人口有三十七万二千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百分之三十三。

由于抗旱救灾抽水灌溉农作物，生产队的集体资金严重不足。用于抽水和

购买抽水机柴油等，全县生产队自有资金已经用完，很多生产队贷款用于抽水灌溉，严重影响到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发展。

一九七九年我在栏江区工作，栏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部分有水的地方栽了稻秧，到六月都全部干死，红苕、玉米、棉花无法育苗播种栽插。从五月份各地就开始打井抽水保苗，到了后来农作物无法保住了，主要是维持人畜生活用水。栏江区当年有新生和吊石岩两个水库都全部干枯，河流也断流干枯，栏江场口一个垭口上的黄葛树都被干死，人们都说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

从上半年起栏江场镇大多数的水井就干枯了，居民生活饮用水发生困难，栏江河里还有一小段有一些水，人们就把有水的那一段拦了起来，作为场镇居民生活用水。

粮站里有一口老井，据说从来没有干过，那口井很深，平常水很充足，用一根扁担栓上水桶就可以把水打上来。由于天干水位下降，这口井水也不多了，用很长的竹竿都够不着打水，只能用机器抽水。而且白天根本就没有水，晚上下半夜才有一点水，粮站负责后勤的人每天凌晨起来抽水，都只能抽半水池水，这半水池水保证粮站和区公所的生活用水。

栏江国营农场是遂宁县的棉花原种基地，为全县提供的棉花种子，旱灾导致棉花种苗全部干死。农场还养了几十头母猪和十多头牛，每天需要大量的水来维持牲畜生存，为了保证人畜用水，农场在干枯的河床中间打了一口井，开始还抗旱取水保苗，后来旱情持续发展，干旱越来越严重，取的水维持人畜饮用都很困难，除了保证食堂做饭用水，其它用水都按人定额分配，每人每天小半盆水洗脸洗脚，洗了脸和脚的水还要收集起来喂猪喂牛。

栏江农村的缺水的状况比场镇更加严重，靠打井找水灌溉保农作物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水田全部开裂，旱地缺水无法播种，早就荒芜，农作物基本全部干死。每个生产队都在打井找水，主要保证人畜生活用水，有的生产队要走几里路去取水。由于旱情持续发展，地面水全部枯竭，地下水位下降，要挖很深的井才有一点浸水。人们在沟里最低处的水田里打井，由于水源枯竭，浸水也很慢，很多井要到深夜井里才有一点水。到了下半夜，农民每一家提着水桶在井边排队，一个人下到井里滔水，每家人一天就只有半桶水来维持生活。

面对百年未遇的自然灾害，各级都非常重视，四川省和绵阳地区都派出了

抗旱工作组驻到栏江，遂宁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长驻栏江，组织抗旱救灾。

据当时的气象预报，预计七月中旬会有中到大雨。根据这一情况，各级都积极做好了雨后抢种农作物的准备工作，因干旱红苕藤已经全部干死，由绵阳地区组织协调，在遂宁周边县组织好红苕藤，一旦下雨将红苕藤运往灾区进行抢种。还准备了秋玉米种和蔬菜种，准备补种秋玉米和蔬菜，组织农民进行生产自救，渡过灾荒。

七月中旬后期，人们盼望已久的大雨终于下了，久旱逢及时雨，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也不顾淋湿衣服，纷纷欢呼着冲进雨中，任其密集的雨点打在身上。省里和地区工作组的领导们此时没有了平时的矜持，随着欢呼的人群冲进雨中，尽情地享受着雨水带来的凉爽，虽然淋得像落汤鸡，但却感觉无比的惬意。

因省、地、县各级准备充分，早在下雨之前遂宁周边邻县将红苕藤组织好了，下雨的当天晚上，遂宁周边的县就把红苕藤源源不断的用汽车运到遂宁受灾的地方，红苕藤主要来自中江、盐亭、三台等地。当天晚上栏江场镇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都被派到莲花乡路口等着，为运红苕藤的汽车带路，将红苕藤运往指定的大队，再由大队分配到每个生产队进行抢栽。红苕藤的抢运从下雨的当天晚上开始，通宵达旦的进行，到第二天下午才结束，在很短的时间内栏江全区的红苕土都栽上了红苕。粮站又供应晚稻种、玉米种，供销部门从外地调来蔬菜种，各地积极组织抗灾自救，抢种补种农作物。

因旱情特别严重，栏江农村大春粮食基本是颗粒无收，缺粮现象严重，各生产队的集体储备粮早就分给农民吃了，到稻谷产新的季节，很多农户家里都没有了粮食，靠到处借粮维持生活。到了后来有存粮的农户也不多，借粮也不容易了，大多家庭已无隔夜粮，经常都是吃了上顿愁下顿。

为了保证农民生活，各级把帮助农民渡荒当成了首要任务，在抓好生产自救的同时，由国家安排农民生活口粮。首先动用生产队的集体储备粮。当年每个生产队都要按粮食总产量提取一定比例的集体储备粮，交到粮站，以备灾荒年使用，动用生产队集体储备粮要公社批准。二是退库粮，就是把上一年交给国家的统购粮超购粮退给生产队，生产队再将退库粮食分到农户。除了这两项粮食，国家还安排了大量的救灾粮食，保证了当年农民渡过了特大灾荒。

为了保证国家下拨的粮食落实到农民手中，区乡干部和粮食部门的职工做了大量的工作，派出了大批的工作人员到各生产队进行调查，摸清灾情，掌握每个农户的缺粮数量，把储备粮、退库粮和国家下拨的救灾粮数量登记造表，落实到每个人头上。

粮食退库从七月份就开始，一个多月时间，粮站仓库全部空了。从当年八月下旬，外地的粮食源源不断的调进栏江，粮食品种以大米为主。这些大米主要来自于绵阳、安县、江油、梓潼等县，大米的品质特别好，都是才加工出来的大米，有的运到栏江仓库里还是热的。

栏江是杂粮和经济作物产区，水稻很少，每年收购水稻只有一百多万斤，仅够供应栏江本场镇人口。一九七九年栏江调入了大米一百五十万斤，折成稻谷二百多万斤，超过了历年的水稻年收购量。农民的救灾粮按分配的数量造表分配到每个农户，经大队公社审核后，直接凭花名册到粮站领粮。

那段时间栏江街上天天都像逢场天那么闹热，满街都是来挑粮的农民，往年交公粮的时候都是一队队的农民挑着粮食送到粮站，这次是一队队的农民从粮站挑着粮食回家。农民们捧着雪白的大米，眼里充满了感激，都说今年受了这么大的灾，要是在以前不知要饿死好多人，不知有多少人要出去逃荒要饭。想不到今年还吃到这么好的大米，比往年的大米还多。

由于各级领导组织得力，准备充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次特大灾害很快就过去了，农民积极进行生产自救，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一九七九年遂宁那场特大旱灾，其干旱程度最重，干旱时间最长，干旱造成的损失最大，至今在遂宁都是史无前例的，但遂宁史料上很少有记载。遂宁县志上都查不到那场特大灾害的详细记载，一九八五年遂宁县《粮食志》仅在大事记里写了一句：一九七九年遂宁县遭受百年未遇特大旱灾，全县调入粮食 1.3 亿斤。那场特大灾害虽然已经过去 40 年了，因为印象非常深刻，经历过的人还经常提起。

作者：谢明铎

电话：13882558828

邮箱：441738436pp@.com

住址：公园中路 83 号一单元六楼二号

（共 3243 字）

## 我的安居故事

1981年7月9日至14日，连续6天的特大暴雨，让涪江沿岸遭遇了一次百年一遇的洪涝灾害，遂宁城区一大半被淹没。洪水退去没两天，刚刚年过18岁的我，从绵阳农业专科学校果林专业第四班毕业，被绵阳地委组织部分配回原籍——遂宁县安排工作。我和回原籍的另外四位遂宁籍同学（其中有安居教体局的彭哲华同学）一道，搭乘绵阳到遂宁的长途班车，因绵遂公路冲毁全线断道，绕道中江、苍山、蓬莱、桂花等地，一路目睹灾后惨象，一路历尽泥泞颠簸，耗时整整一天，回到了遂宁。

毕业分配，我的第一愿望就是留在绵阳。绵阳，那个时候可是绵阳人民心里的中心，就像成都、北京在四川、在中国的地位一样。但这个愿望很快落空了。

回到遂宁，我的最大愿望又是能到县果品公司工作，一是因为专业对口，能够学以致用，同时又能实现从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跨越。估计和所有农村人一样，能做一个城里人也是我从小的梦想。尽管生下来我就拥有城市户籍，吃的“供应粮”，但因为父母在农村学校从教，我生长在农村，自己觉得还不完全是一个城里人。

但是，第二个愿望很快也破灭了。当年，中央规定，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全部分配到县以下的基层工作，时任遂宁县委副书记、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古勤生老人家说，把“小李娃”安排到一个离城近一点的地方去，于是，我分配到了南强区公所，担任区公所文书（注1）。南强区公所当时的驻地在广德寺寺庙里，与

县教仪厂、地质调查 2318 队为邻，共用寺庙，离城步行 10 分钟左右，其他四位同学都去了比较远的西眉、桂花、永兴等区公所。这几个地方现在看来很近，可那个年代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感觉远得很呐！

时间一晃到了 1983 年初，作为幸运儿，我调入遂宁县委办公室秘书组工作半年多时间，就与安居相遇，发生了第一个安居故事——

### 参与安居坝公社政社分设改革试点

1978 年 11 月 24 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一间茅屋里，18 位农民签订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1980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1982 年 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于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

大包干的推行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比如，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实行的是队为基础（即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人民公社三级核算制度，人民公社的实际属性是经济组织，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政府组织。如何让社会管制和公共服务职能回归政府，让经济管理服务职能赋予经济组织，就成了 1983 年政社分设改革试点的探索目标。

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公社党委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经济联合社，实现政社组织分设和职能分离。试点改革工作历时三个月，由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泽良牵头，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工作组起草了经济联合社的章程，搭建了联合社的班子，在安居坝公社形成了党委、公社、联合社三套班子的组织架构和领导格局。

试点任务结束后，其成果既没有巩固下来，也没有推广开去。现在想来，当初参与试点工作的同志 MPA 方面的知识储备极度匮乏，那个时候的干部很多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再加上国家在指导改革的思路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改革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这为随之而来的公社改乡、管理委员会改人民政府热了身。乡人民政府建立起来以后，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传统集体

经济制度解体，经济联合社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试点工作让我第一次用刚刚成人的视角深入接触了农村和农民群体，无意间观察到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农村初生的“重点户”、“专业户”现象。在完成规定任务的同时，我自己选题，写成了《认真分析“两户”的现状——做好切切实实的扶持工作——安居坝公社的调查》一文，受到时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傅定国的肯定，经他修改，该文由县委办公室主办的内刊《调查研究》第二期刊载（附1）。这是我在县以上刊物发表的第一篇调研文章。写这篇文章，虽然没人让我5加2、白加黑，但却是主动的996。可见，兴趣对一个人的主动作为有多么的重要！经此，我也潜意识的感觉到自己具有一定的研究潜能了（注2）。

回望那个时候的安居坝，老318线沿线两排小青瓦平房，有两条小叉街，唯一的楼房是安居供销社的一栋综合楼。工作组的人就住在楼顶的招待所里，一个房间里四张床，小木床铺满谷草再搭上棉絮，其他啥也没有，条件极其简陋。我们的行李也一样，一张毛巾、一把牙刷、一支笔、一个本子，洗完脸的脸盆马上又变成了洗脚盆。每到周末或者半个月了才乘班车回城换洗衣服，那个时候的卫生观念和卫生习惯可不像现在这么讲究，再加上往返一次得颠簸半天，哪像现在10几分钟的小事情？尽管如此，当时的安居坝也是318国道沿线上比较繁华的集镇之一了。现在，安居城区扩大了若干倍，老318沿线也变了样，供销社那栋红砖小楼还在不在？在哪个位置？没人指引我已经认不出来了，尽管我去追寻了好几次。

在安居坝期间的业余生活单调又有趣。记得很多时候都是晚饭后到供销社二楼楼头一间乒乓室打球，和我打球最多的也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20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相遇时，他自我介绍说，打乒乓球的人是他，他当时中专毕业分配到安居供销社工作不久，从事财务工作，他的名字叫鲍志红。彼时，他创办的企业“福彩地”风生水起，已在全省民间金融领域小有名气，后来，福彩地与其他民间金融企业一样陷入了“非吸”困境，这是后话了。他一直记得我，我却没记住他，嘴上没说，其实心里非常愧疚。我们晚饭后也转转街，一条小街走过去转回来反复走，从每家每户的门前过，觉得看什么都新鲜。几个商店主要是供销社的营业网点，从生活必需品到农用物质什么都有。一次闲逛，偶然发现

一对新上柜的不锈钢锅铲和饭瓢，爱不释手，几角钱就买回了家，至今 36 年了还用着，非常顺手，丝毫没有破损，与今天的不锈钢制品比起来，虽然加工没那么精细，但也差不了那里去，足见质量很好，这两个物件已经成为我心中的传家宝。在那之前，几乎所有家庭用的都是铁匠铺手工打制的铁质锅铲和饭瓢，加工的精细程度根本不能与不锈钢制品相比。它们的回家入列，意味着我们家的厨房用品一步跨入了不锈钢时代。

记得最热闹的是赶场天，周围的村民仿佛一下子全部进了场镇，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摩肩擦背，买东西、卖东西、看热闹的都有，尤其是卖打药的地摊热闹，不管买不买打药，人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个水泄不通，津津有味、全神贯注的听摊主的“脱口秀”，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工广告，摊主手舞足蹈、声情并茂，脱口秀合拍押韵、一气呵成、嬉笑怒骂、诙谐搞笑，两三个小时不重复，极具吸引力，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收钱找零拿递货品，一点不乱、两不耽误，看得出来，不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绝对做不到。在文化生活贫乏的当时，听卖打药无异于听戏看演出，是一种享受。可惜现在这样的民俗文化形式消失了，再也看不到啦。后来在船山区委工作期间，听说杜才友（时任新桥镇党委书记、曾任安居区副区长）年轻的时候卖过打药，应大家的要求、趁着酒兴表演过几段，倒是还原了那个味道，证明名声不是吹的。安居建区的时候，分析安居区的产业构成，有的干部群众玩笑说：重工业打铁，轻工业弹棉花，如果加上一句，零售业卖打药，哈哈！这才更形象呢。

还记得当时安居区（区公所）供销社主任叫詹瑞先，在他的领导下，供销社创办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单位，这个荣誉一直延续到遂宁建市以后若干年，到 90 年代，供销社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一度成为市中区的纳税大户（纳税上千万元）。后来，受民营企业 and 个体户大量兴起的竞争冲击，供销社每况愈下，最后，“股金”问题爆发，成了压死牛的最后一根稻草（注 3），到 1998 年遂宁市中区大规模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三年攻坚”时，由我具体推动，完成了全区供销社的解体清算，只保留了市中区联社，创下了全省的唯一。改革主要按照“处置资产、清收债权、买断工龄、分流职工、兑付股金和清偿债务”的方法和步骤进行。改革推动了民营经济的高增长，但 1200 多名职工下岗，再加上全区 400 多户国营、集体、乡镇、街道企业的下岗职工，其中部分下岗职工再就业受

阻，陷入了一定程度的生活困难，埋下了不少的社会矛盾隐患。2004至2005年我任船山区委副书记期间，根据市委、区委的安排（说我改的我熟悉情况），与安居区联动，牵头建立了大病医疗统筹制度，惠及了一部分下岗职工，大大缓解和平息了部分矛盾。前些年，我经常问自己，这个改革哪些改对了？哪些改得不好？现在看来，党的19大精神给出了科学的回答。

时间飞快进入到1986年7月，也进入到我的第二个安居故事——

### 参加决山乡村级整党试点

1986年，是遂宁建市、遂宁县改设遂宁市中区的第二年，也是我结婚的次年。建市前，县委办秘书组就两个年轻人，建市时一个去了市政府办公室，我则到了市中区委办公室。这年，我虽23岁，却成了区委办的“元老”，因为原县委办的领导和其他老同志都提拔到市级机关工作去了，只有我一个到了区委办，后来调入区委办的几位如周新、邓斌、刘锋华等等好兄弟都叫我“李老师”，让我欲罢不能。若干年后，他们才慢慢的改叫我“劲哥”。后来，我终于懂得了谦虚，说我只能算大家的师兄而已啊。

按照中央的部署，当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村级整党工作，解决村级组织软懒散问题。市委、区委同时决定在决山乡联合开展试点工作。市中区委主管整党工作的副书记是朱明中，改革开放以后首批选拔的知识分子领导，来自于南强中学校长的任上，建市前担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温文尔雅、思路清晰、水平较高，在我的眼里，是文教系统代表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提拔到党政领导岗位上适应能力强，表现比较优异的一位，受到我内心的尊重。区委整党办主任由区纪委副书记蔡其永兼任，他是我的同校师兄，学的是农业经营管理专业，在县农业局工作没几年就去白马区公所当了区长，估计也就20多岁，是地地道道的年轻干部。

决山乡村级整党试点市区两级联合组成了21人的工作组，区委把我抽调出来参加试点，主要负责简报和其他文字工作，任务非常明确。工作组成员中有从市、区两级部门抽调的人，也有从乡镇抽调的人，组长叫段吉达，原南强区保升

乡的党委书记，我在南强区公所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相熟。后来老段在遂宁工业园区工作，负责信访综治维稳工作，2005年底我到市委政法委以后，他已经退居二线，无缘再度共事，但他的同事经常提起他，称他“段大爷”，夸他“搁得平”，我想这是他本乡本土人、人熟地熟情况熟、工作经验丰富的原因。

工作组7月1号入驻决山乡，8月9号撤离，历时40天，可谓短平快。试点工作分为学习整党文件、对照检查与整改、组织处理与党员登记三个阶段，采取学、讲、看、查四种方式，即：学习整党文件，讲好理想宗旨、农村经济形势和农村政策、民主与法制，看发展商品生产先进典型和两山英模报告，查为人民服务、抵制不正之风、先锋模范作用、党群关系和廉洁奉公、遵守纪律做得怎么样？

那个时候的工作作风非常深入。除了全乡的集中活动，其他时候工作组和乡里的同志每天早饭后照例开早会，三言两语把当天的工作做一交代，然后大家分头行动，顶着烈日徒步走村入户，一人一顶草帽、一把扇子，这是标配。那个时候，外出务工尚未兴起，农村还是一幅幅人丁兴旺炊烟袅袅、田间地头穿梭繁忙的景象。我们逐村逐户与党员、群众座谈，宣传政策、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与党员面对面几乎全覆盖，也覆盖了很大一部分群众。午饭回不了乡里，都由村里安排在农户家里吃饭，主人一般都翻箱倒柜、倾其所有，有时候还上一点高粱酒，一个土碗倒满，依次在桌上传递，喝一口，用手在碗沿上一擦，递给下一位，不像现在分开喝。用手擦碗沿，现在看极不卫生，但那个时候却是对人最尊重的表示。那时我不喝酒，传到我手里也就做做样子，马上又递给下一位。在群众家吃饭不是免费的，事后我们都要付钱，也没有拿回单位报销一说。不像后来一度时期纪律松弛了，上级到基层、干部到群众家里吃饭，吃完就抹嘴走人，恶化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危害不小，教训深刻。晚上回到乡里后，照例是短会，每个人汇报全天的工作情况，以便及时汇总形成简报上报信息。

决山乡在玉丰乡去三家区的途中，是一个小乡，选择它作为试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工作量不大。地理位置比安居坝偏多了，条件也差了很远。除了乡政府的几间小青瓦平房，就是散落在周围的几户人家，当然，在乡政府周围能修房子的也是比较富裕的，因为好几户都是两层的简易红砖小楼，工作组的人就租住在他们的楼上，分住几间大屋，每间房好几个人不等。我们去之前乡里就提前搭好

了床铺，也不知道是买的还是借的，21张一张不少。在这里，我们打不了乒乓也逛不了街，唯一的娱乐是早晚听喇叭广播。直到现在，我对各种戏剧都没兴趣，可有一天突然从广播里听到川剧折子戏《花田写扇》，几句对白过后我就被深深吸引，站在泥土路面的小马路边、矗立在喇叭杆子旁，从头到尾听完了这出戏，心潮随插科打诨、机变百般的剧情跌宕起伏，不时开怀大笑，完全入戏！后来，我又完整的听了几次重播，《花田写扇》也成了我唯一记得住的川剧剧目。每天晚上日落以后，大家就围坐在床边，从代销店买来几包五角钱一袋的油炸豌豆米，用茶杯盖倒上老段从保升乡提来的高粱酒，边吃边喝，约定每个人依次讲笑话，打发时间，并且要求不重复。那些笑话有雅有俗，以俗为主，有的类似今天的“黄段子”。有诗词改编的，有对联的，有歇后语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段子可能口口相传了千百年。每讲完一个，都引来大家哄堂大笑，前仰后合，十分热闹。我的人生阅历短，讲不出什么来，主要是听、憨笑。现在看来，这是我人生中最集中的一次接触到的民间俗文化，从中窥见了人间百态，受益不浅。比如，“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方到嘴唇边”，“吸烟摇扇，眼前风云聚会；窝尿放屁，胯下雷雨交加”等等就是那个时候听来的，补了我传统文化的课啊。

就在决山，我认识了王海全。7月，海全从西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毕业，作为省委组织部遴选的“优大生”，分配到决山乡工作。其时，我也刚刚从他的同校同系函授班毕业一年。在学校，有人发现我唱歌还有点水准，被班里推荐和他们班的一位女同学、团支部书记（后来这位女同学读完博士去了上海证券管理办公室工作）一起在系里的一个晚会上表演了一首男女声二重唱，那时的农经系是热门专业，在西农规模最大，在校学生近千人，竟然“一唱成名”，海全认识了我，但我不认识他。到了决山，他马上找到我这位“师兄”，自报家门、彻夜长谈，说了些什么已经毫无记忆，但我记得他提起了认识我的过程。1998年下半年，我卸任市政府城市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留任市中区政府副区长，主管体制改革工作（分工之一），他已任区体改办主任，开始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段共事，我们共同努力，用三年多时间基本完成了全区400多户企业的改制工作，也留下了他理论功底扎实、政策水平高、思路清晰、思维灵活、办法多、点子多、文字功底好、说话搞笑等等深刻印象。2001年底，省委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参加对口援助“三州”工作，已任安居镇党委书记的海全又随我赴凉山州金

阳县，我任县委副书记，他任县长助理，“高山峡谷任我行、携手并肩两年半”，2004年结束任务返回遂宁后不久，海全被提拔为安居区政府副区长。

整党试点结束后，由我代乡党委起草了在全区整党工作会议上的经验交流材料《我们乡是怎样开展村级整党工作的》（附2）一文，随后，又总结提炼出了《我们在村级整党试点中对党员教育的几点做法》（附3）向省里报送，没想到，省里选中了这篇稿子，在10月召开的四川省村级整党经验交流会上由蔡其永代表遂宁作了大会发言，估计他高兴了很长时间。1987年元旦，我的儿子问世，我去请假照顾母子，他爽快的说，这段时间你不用来上班了，有事通知你。从中，我感到这既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的关怀和照顾，宽严有度，我内心很温暖，至今心存感激，同时，也让我开始品味出什么是领导的格局和气度，受益良多。

1987年，我去市中区计经委担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调入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从事时任常务副市长邹国光同志的秘书工作，离开了蔡其永，没想到6年以后我又回到了市中区，并开始了与他的紧密共事，这就有了我的第三个安居故事——

#### 领导安居镇省级小集镇建设试点

1989年，遂宁市迎来了第一次换届。深受遂宁人民敬重的国光同志因为年龄原因去市政协担任了第二任政协主席，我也于次年提拔为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并很快转任新组建的调研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就在当年，任全辉在第二任遂宁市长岗位上工作一年左右，调任涪陵地委书记，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罗元富同志调任遂宁市长，根据组织安排，我又重操旧业，做罗市长的秘书工作。1992年，罗市长改任市委书记，我随调市委办一秘书科。

元富同志担任市委书记以后，很快提出了市中区和蓬溪县分别一分为二的动议。那个时候，劳务输出尚未全面兴起，市中区、蓬溪县都是百万以上的人口大县，射洪人口也近百万，尤其是市中区、蓬溪县管辖范围大，管理幅度宽，交通又不便，行政成本高，同时，市辖三个县级行政单位，只要担任了区委书记，

基本上都会顺利的成为市级领导，干部的成长缺少竞争磨砺，这在大的市州几乎是想都不能想的事情。比如后来我去的凉山州，17 个县市，很多书记回州里工作只能安排部门副职。实现分设，就可以部分的消化这些问题并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产生新的增长点，带来新的好处。这一动议逐步形成市委的共识并纳入了工作计划，开始了向省政府和民政部的申报工作。其中，市中区分设的方案是在安居镇建区或县，主要理由是安居镇在拟设的安居区辖区内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比较方便，场镇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地势平坦，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等等。

申报工作虽一波三折，但没有影响市里的各项准备工作。1994 年上半年，我与市委组织部的一位科长杨建中同时下派到市中区政府担任区长助理（时任区长罗勤宏）。同年，全省启动了重点小集镇建设试点工作，安居镇入选其中，成为省级试点镇之一。区委区政府决定，由我兼任区集镇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安居镇集镇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领导试点工作。其时，虽没公开讲，但大家都知道是为建区做准备。

领导小组最重要的组成单位是建设局（当时含规划职能）、国土局、交通局。时任建设局局长就是蔡其永。我们又到一起了！

遂宁建市时，建成区面积 2.8 平方公里，城区人口 13 万人左右，除街市花园百货公司、川北教育学院几栋三层楼房外，“满城尽是小青瓦”，街道狭窄、道路泥泞，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形同如今偏远地区的边远小镇。建市以后，市委定下了以“旧城改造为主、新区开发为辅”的城市建设方针，随即拉开了遂宁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城改造，以南北干道（现遂州路）的贯通为先导，老城区以小木楼、小青瓦为特征的清代、民国时期的建筑被大量拆迁、大量消失，如果保留下来，老城的规模不会小于阆中古城。主管城市改造工作的就是国光同志。第二届政府开始，元富同志力主并启动了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和建设，拉开了遂宁城市新区建设的序幕。我随他们左右，耳濡目染了他们的言传身教，已经有了城市建设方面的基本知识。但是，完成从旁观者到操作者的转变，还是让人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接受任命以后，我首先参加了区里关于安居集镇建设规划方案讨论，建设局提供的方案有大中小三套，三套方案中最核心的内容是 318 线如何改道、规划区面积多大的问题。区领导中基于不同角度的认知，支持大中小方案的都有，我主

张立足长远，采用大方案，虽然面临财力支撑不足的巨大困难。区委对我的意见很重视，采纳了我的意见，除了意见有一定合理性外，市委主要领导有没有交代意图给我可能也是他们考量的一个因素。

方案定下来以后，如何启动建设就成了大问题。我带着这个问题逐个听取成员单位负责人的意见，摸情况，听建议，虚心求教。大家真诚建言，几乎招招有用。一个星期左右的功夫，情况清楚了，思路也形成了。心中豁然开朗！

当时安居的情况是，省级小集镇建设试点政策主要有三项，一是允许试点镇通过收取一定数额增容费办理“农转非”（俗称“卖户口”），之前，镇里已经敞开大门，收入了一笔钱，大概 60 多万元左右，这也是启动建设的唯一一笔钱；二是 100 亩用于试点镇建设的征地指标；三是建设银行 100 万低息贷款额度。基于这一现实，大家一致认为，集镇建设不能全面开花，318 线的改建是集镇建设的牛鼻子，只有新的道路骨架形成了，集镇其他建设才能展开，必须循序渐进。于是，启动长 3.68 公里、宽 40 米（含主跨 60 米、宽 24 米的桥一座）的新 318 线建设（当时叫镇南过境一级公路），同时建设长 960 米、宽 30 米的镇东大街（现兴业路、形成新老城区的连接线）成了当年集镇建设的首要目标。同时，启动自来水厂、天然气引输、电力设施改造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先搞路水电气！

318 新线虽为国道，但考虑建成后将为城区共用，因此我们决定按城市道路标准设计建设，因资金不足我们决定用路基一次建成、路面分步施工的办法处理，先形成两个车道的水泥路面保证通行。按照这个方案，工程概算接近 3000 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大项目！

资金从何而来呢？这成为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大问题。60 万“卖户口”的钱只能基本满足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所需，100 万贷款何时能跑完手续不得而知，100 亩土地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审批更说不清楚，怎么办？我们决定，公开招投标（此时国家尚未建立招投标制度），向投标方收取各种保证金、设置工程垫资 40% 以上的招标条款，使用承包方的资金启动工程，缺口部分依靠政策贷款、工程完工以后的路桥收费（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禁止性规定）、后期土地开发收入等解决并偿还工程垫资。实施“负债经营”。（注 4）

1994 年 6 月，市区两级审查同意了这一工作思路，要求当年底必须启动工程建设，1995 年 10 月前争取通车。我们从 7 月上旬着手至 9 月底，仅两个多月

时间，迅速完成了 240 亩工程建设用地的征用、7000 多平米农房的拆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招标等大量前期工作，按预定设想，9 月底全线开工。

工程建设途中，时任省长宋宝瑞来遂宁调研，返回成都时，在元富同志、李太银（时任遂宁市市长）、罗勤宏、张锦明（时任市中区区长）陪同下，视察了过境公路路桥建设工地。我随省长他们伫立桥头，主要由罗勤宏简要汇报集镇建设有关情况（当然也包含了建区有关准备情况）。因为之前经常随元富同志参加省委的活动，常常见到宝瑞省长，心里少了一些胆怯，我也偶尔插话补充，主要讲问题困难，寻求省长的支持帮助，果然，宋省长离开之前交代随行交通厅厅长刘中山给以关注，其后不久，交通厅通知给予工程专项补助 100 万元。须知交通厅的钱都是计划安排，挤出这笔钱来也实属不易。路基和大桥桥面全线贯通不久，时任省委书记谢世杰赴遂调研，事前通知我们做好他上工地的准备，但他出发时间因故延迟到晚饭后，待他的车队从成都方向通过过境公路时已是晚上十点钟左右，临时取消了查看工地的安排。世杰同志和宝瑞同志先后关心安居集镇建设，温暖了我们的心，鼓舞了我们的士气，更加清晰了我们对这项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为我们注入了新的工作动力。

尽管我们紧赶慢赶、全力以赴，1995 年 10 月通车的目标仍然没实现。到 1995 年底，工程第三标段全面竣工并验收合格，一、二标段和大桥引道路面工程，因连降小雨和保升桥扩建断道、材料无法进场延误，30 米大街排水管铺设完毕；天然气引输工程完成供气站房主体工程、输气主管铺设至玉丰、入户供气管道铺设完毕；镇内架设了供电专线，利用琼江流域的三个小水电构成了自成一体的供电系统，第一次实现了镇内的可常年用电。

1995 年 5 月至 8 月，组织上按照程序相继完成了对我的市中区政府城市工作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城市工作办公室主任、市中区政府副区长的任命，我的工作职责随之转移到城工办。1996 年初，安居集镇建设试点工作的未尽事宜我向区政府分管副区长做了移交，我的第三个安居故事就此落幕。

幕虽落下，若干花絮却在心头萦绕。难忘的是蔡其永（建设局长）、吴家国（国土局长）、唐振尧（交通局长）三位大哥，由我出任组长领导安居集镇建设工作，他们没有欺我年龄小、资历短、阅历浅，设障碍、出难题，而是倾力相助，全力扶持我这个小兄弟干好工作，特别是我的老领导蔡其永，放下架子，甘当助

手，在我畏难的时候鼓劲加油打气，敢担当不退缩的精神无声的传递给我，给我很大激励，终生难忘。

时任安居镇党委书记周闯，是区委为加强集镇建设的领导力量，专门从马家乡党委书记任上调来的。罗勤宏交代我说，周闯敢说敢干，是个“闯王”，堪当大任。实践证明，“闯哥”大气耿直，粗中有细，敢作敢当，执行力强，此评价一点不过。工程进行到中途，镇长调离，区委常委会讨论镇长人选，候选人是时任安居镇副镇长吴银明（人称吴三哥）、许洪兴，都很优秀，已任区委书记的罗勤宏把目光指向我说，当前安居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镇建设，谁热心和支持集镇建设，谁就当镇长，我不假思索的马上回答，那就吴银明吧，罗勤宏当即一锤定音。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因为我的一个倾向表达，推迟了许洪兴同志的进步，如果我能同时建议在其他岗位提任许洪兴同志那有多好啊？还是经验不足！三哥是安居人，对镇情知根知底，与闯哥高度互补，和闯哥搭档以后，配合默契、珠联璧合，攻坚克难、无往不利，用行动和事实诠释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负责工程设计和工程管理的两个小兄弟是建设局派出的沈华伦和龙海凡（现安居区临港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华伦当时个子瘦小，戏称“沈干薪儿”，性格比较外向，海凡相对内敛，两个干事都很踏实。爱开玩笑的华伦和“干精火旺”身材同样瘦小的吴三哥“门当户对”，经常说“夺夺句”，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味同相声，十分搞笑。一天中午，六月高温大热，大家大汗淋漓从工地回来，刚刚跨入镇政府大门，一股劲风穿堂而过，送来极度凉爽，正在此时，华伦大叫：三哥，赶快把门拉倒，大家问：拉倒门做啥子？华伦答：免得风把他吹走了！我们随即哄堂大笑，笑声刚起，三哥立马怼出：沈华伦，我要在你背壳上贴个标语：严禁烟火、严防火灾！两人反应之快、应对之妙，让人拍案。众人再笑，东倒西歪，经久不息。多年以后，大家相聚，仍然常常提起这事，回味那份畅快。

去职城工办后，我于1998年转至遂宁市中区政府副区长岗位履职约三年。在此期间，发生了我的第四个安居故事——

接力主持国道318线安（居）乐（至）路改造工程

遂宁建市时，第一届市委根据省委要求，结合遂宁实际，研究确立了符合当时市情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城乡结合、协调发展，探索川中丘陵地区经济发展人民致富的新路子”的工作思路；元富同志担任第二届市委书记后（席义方同志担任第二届市委书记两年半左右调任省委后接任），根据遂宁地处川中这一最大的区位优势、基于把遂宁建成川中工商业区域中心城市的愿景，提出了“在中字上做文章，在通字上下功夫”的“中通战略”，这一战略，突显了地处四川中部这一区位资源的稀缺性，突出了通过交通条件的改善实现加深与成渝之间的融合对于推动遂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要致富先修路），在实践中取得了重要成果：与交通厅合作启动了遂回高速（现遂渝高速的一段）的建设、推动了城南高速的早日上马；到邓川同志担任第三届市委后半段书记后，市委的工作思路虽然与时俱进的过渡到“两化（城市化、工业化）互动，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上来，但对交通建设的重视从来也没有放松，提出了“四向拓展，打通出口”的要求，全市各区县争先恐后的启动了以国道 318 线、省道 205 线为主的路网升级改造工程。

市中区也不甘落后。1998 年 5 月，区长何顺洪亲任指挥长，按一级公路的标准，启动并于 1999 年 5 月完成了国道 318 线遂（宁）安（居）路的改造建设。2000 年和 2001 年，又按二级路标准先后拉开了遂蓬路、安乐路的改造建设。

安乐路改造工程开始由区政府与四川华燕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由四川华燕公司为项目业主、全额出资建设，拟用路桥费收回投资后，产权及收益收归政府所有。实行“政府组织，业主负责，项目管理”，类似现在的 PPP 模式，区里的所有建设项目都从那时开始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制、投资制、工程建设监理制、工程合同管理制等等。华燕公司进场后，在塘河村境内的垭口处开辟作业面开挖土方不久，因为资金断链等原因，施工陷入停滞状态。正当其时，遂宁市、市中区第三次换届结束，何顺洪接替张锦明出任区委书记，张云尧出任区长，区委随即调整安乐路建设工程指挥部，由张云尧担任指挥长，由我接替已调开发区工作的常务副区长罗仁树担任常务副指挥长，具体负责安乐路的建设工作。

鉴于华燕公司后继乏力、施工停摆的现状，区委决定，终止与华燕公司的合作，将安乐路按两公里左右一个标段分拆为 10 余个标段，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分散工程量及资金组织、施工组织的压力，加快工程进度。我接手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终止合作关系，这无疑是一个挑战。

我与指挥部的同志们分析，通过协商和谈判的方式、或者通过司法程序的方式解决问题可能旷日持久，不能满足区委“尽快了结”的要求。怎么办？我们决定采取强制驱离出场的方式，先迅速打开新的工作通道，再回头处理遗留问题，两条腿同步走。行动的那天早上一上班，我召集指挥部治安科及其他相关同志布置任务，要求他们即刻赶赴乙方工程项目部，控制人员和现场、查封并带回工程资料（特别是已发生工程量计量资料，以便以后结算）、撤出全部施工人员和机具。带队警官是市中区公安分局原城区治安整治办公室主任陈和平，执行力超强，不到中午时分，电话里传来消息，完全实现预设目的，我一颗悬空的心终于落了地，因为，如果行动前走漏了风声或行动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节外生枝或陷入僵局，难以收场。那个时期，我同时负责成南高速公路中区段、遂回高速公路中区段建设和全区企业改制工作，面对的矛盾冲突形形色色、数量众多、尖锐复杂，遭遇像这样的“惊险一跳”接二连三、不胜枚举，但最终都艰难的一次一次翻越了过去，没有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至今，我仍然为之庆幸不已。与此同时，我也在不断的思索成败得失，比如，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大，可以带来行政高效率，当目的具有正当性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充分使用则有利于国家、集体和公众利益（虽然对行政相对方有失公正）高效率的实现（正因为如此，我国行政法体系建设中至今仍然贯彻了行政权优先的理念和精神），但是，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提高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进步，我们也应大力防止行政优先权的过度使用和滥用，否则，将导致社会显失公正，激化社会矛盾。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大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加快依法治国进程，进一步约束行政权力冲动，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

终止合作关系后，我们立即进入招投标环节。招投标体现了快节奏。指挥部在媒体上公开发布招标公告三天后，我们就在玉堂街交通局五楼会议室举行招标会，组成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纪委派员参加的评标小组，接标、拆封，资格审查，写黑板公布报标主要指标，当众评标打分，上黑板公布评分结果，宣布中标单位，填写并发放中标通知书一气呵成，过程全透明，半天时间就完成了招投标工作。一个月内，十几个施工单位同时进场，顺利拉开了工程建设。

工程一上马，尤其是前期，几乎每天都会出现需要增加工程用地、增加拆迁

补偿、增加工程量等等问题，频繁的上工地就成了家常便饭，一处一处现场查看情况，一处一处决定处理办法，尽快排出施工障碍，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为了保证质量、加快进度，除加强日常协调和监管外，指挥部采取月评比、月奖惩的办法，每月召开总结会，宣布评比结果，现金奖励前三名，罚款处罚后三名。工程管理既有制度手段、也有经济激励、还有政治动员。现在看来，政治动员不宜操之过急，否则，有可能与工程建设的客观规律相冲突，欲速不达。

工程的日常管理虽然琐碎，但还比较容易掌控。挖断军用光缆，则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成都军区通信总站的函告中，计算的经济损失多达上千万，更别提“军事损失、政治损失”等等了，我立即带队前赴通信总站，表达歉意、说明情况和困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态度诚恳、沟通有效，商定由通信总站派部队实施光缆的迁改施工，我们只付了迁改的施工费，大大的节约了迁改经费。

安乐路工程概算为一个多亿，组织资金是个大问题。当时，农业银行遂宁分行与我们形成了比较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商定，按照省分行最大审贷规模 3000 万元的额度向省分行分笔申请贷款。在张云尧、刘文斗（农行行长）带领下，我们前往成都当晚，云尧同志告诉我，第二天由我汇报情况，我连夜准备提纲，次日，在省分行信贷处处长办公室，我从项目名称、项目概况、项目实施计划、项目资金需求、还贷资金来源等几个方面一一汇报，耗时 30 分钟。处长听完汇报说：如果不考虑审贷程序，仅凭李区长的汇报就可以发放这笔贷款了（意指汇报清晰、严密、说服力强）。这让我们一行人面露喜悦。这次汇报，为落实这笔贷款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到 2001 年 11 月，安乐路路基土石方工程全部完成，部分标段开始路面工程施工，我也外派工作，离开了遂宁。安乐路工作按照区委的安排移交给了交通局长林建国同志。很快，建国提任副区长，领导了安乐路后半段的建设工作。

2002 年 10 月，安乐路全线通车，乐至县境内也基本同步改造完成，到简阳与成渝高速联通，至此，遂宁到成都的公路交通由过去的早发夕至、有时候两头摸黑，缩短时间到 3 至 3 个半小时； 2001 年 12 月 27 日遂回高速、2003 年 12 月 23 日成南高速相继贯通，遂宁的交通迈入了高速时代，遂宁到成都的通行时间再次缩短至 1 个半小时，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完成了遂宁交通史上的两次重大跨越。回想这些，我有幸成为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内心和那

些奉献过的前辈们、还有正在创造着的后来人一样，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感！

此后，我的工作几经变动，一步一步离安居远去，过去的故事也渐渐退去五颜六色的色彩模糊了起来（注5）。一万个没想到，整整15年后的2016年2月，我因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岗位上任职10年，必须轮岗，市委安排我出任安居区政协主席一职，我又来到了安居，来到了我和众多战友留下了几多回忆和无尽眷恋的故地，续写又一个安居故事。这个故事正在进行中……

安居区政协 李劲 写于2019年6月

注释：

1、到基层工作，让我从此永久的告别了我学习三年的果林专业，走上了一条与初心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1998年，遂宁市中区按照中央的部署，“抓大放小”，全面拉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我作为主管改革的副区长，亲自组织了果品公司的股份制改造，2004-2005年，我任遂宁市船山区委副书记分管经济工作，又推动了果品公司的破产解体和遗留问题的处理。如果当初去了果品公司，我就从改革组织者变成了被改革者，30多岁40来岁的时候就下岗了！人生又是另外一幅景象，焉知祸福？

2、1990年前后，在市政府办公室调研科工作期间，潜心研究心仪的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经济领域的问题，10余篇论文发表于《财经科学》、《城市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等国家核心学术期刊。其中《小城市市带县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收入当年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城市经济学卷和《新华文摘》重要学术论文目录。专著《市领导县问题研究》获第六届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二等奖、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科研成果二等奖。

3、在我的记忆里，遂宁的财富故事变着花样轮番上演：80年代饲养海狸鼠；90年代“天价”兰花、“天价”普洱茶、供销社“股金”；00年代股市、房价飞涨；10年代非法集资，“击鼓传花”，参与者众，竞相追逐超额利益，最终链条断裂、泡沫破灭、损失惨重。读此文者尤其是后来者当引以为戒。

4、安居集镇建设形成的资金筹集模式被后来很多工程项目借鉴，对如何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提前干事且办成一些大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因资金供应不足带来工期、质量都无法有效保证，甲（政府）乙（工程承包方）双方因利益争夺关系普遍紧张，双方诚信都遭严重损害，利弊参半，有的甚至弊大于利，如诱发农民工集访群访，爆发不稳定事件，或者产生“豆腐渣”工程，损失惨重。历史经验应当吸取，把不好度“宽严皆误”。

5、2019年6月的一天，我与安居政协文化文史学习委员会主任卢平安同志商讨文史资料征集编纂工作，我无意中提到安居一些过去的情况，卢主任突然鼓励我说，主席你的肚子里就有料，你能不能够写一点文史资料嘛？当时我极力推脱，怕完不成任务，不想几天以后尘封多年的往事竟然逐渐清晰，键盘欲越来越浓，耗时一个星期草就此文，奉献给大家，既是以实际行动支持文史资料工作，也是我向当年那些在文中提到和没提到的老领导、老同事的敬礼！

附件一：《认真分析“两户”的现状 做好切切实实的扶持工作——安居坝公社的调查》

附件二：《我们乡是怎样开展村级整党工作的》（中共决山乡党委）

附件三：《我们在村级整党试点中对党员教育的几点做法》（中共遂宁市市中区委整党办公室）

附件一：

调 查 研 究

第二期

中共遂宁县委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



---

认真分析“两户”的现状  
做好切切实实的扶持工作  
——安居坝公社的调查

应运而生的重点户、专业户，在农村中首先富裕起来，为全体农民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那么，他们在发展生产中究竟有些什么特点，他们目前在农村中所处的地位如何，干部在扶持“两户”中应注意那些问题呢？春节前，我们在安居坝公社结合开展其他工作进行了一次调查，通过调查分析，得出了以下一些看法。多系管窥之见，供各级领导参考。

一

安居坝公社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较好。社员经营的品种除粮食、生猪外，在种植、养殖业上，海椒、生姜、罐头蕃茄、蔬菜、柑桔、蘑菇、蚕桑都具有优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全公社农副业生产发展很快，1982年达到人平生产粮食902斤，人平收入314元，均高于全县人平产粮876斤，人平收入280元的水平。去年底今年初，全社筛选确定出88户重点户、专业户。这88户农户，82年人平生产粮食1108斤，比全社平均数高206斤；人平总收入524元，比全社平均数高210元。1983年，计划人平增加粮食125斤，比全社人平增加80斤高45斤；人平总收入将达到687.80元，比82年增加163.58元，比全社人平增加49.50元高二点二倍。从以上数据来看，安居坝公社这88户农户当前的生产水平、收入水平是比较高的，在全县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这些农户在勤劳致富上走到了全社的前面，主要是他们坚信党的现行政策，思想顾虑少；在普遍推行生产责任制后积极性很高；有经济头脑，善于发挥自己的各种优势，如劳力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善于利用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发展商品生产。

他们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且注意调整作物布局，在保证粮食稳步增

长的前提下，将生产的重点转移到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和养殖业上来。1982年，这88户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占总收入的32%，1983年下降为27%左右。1983年增加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和畜牧业，经济作物收入增加48.4%；经济林木收入增加55.5%；畜牧业收入增加42.2%。粮食耕种面积将继续减少，如凤凰湾大队二队许清从，全家6人，83年他家的经济作物面积由82年的4.7亩扩大到9.7亩，主要是扩种海椒和蕃茄，经济作物收入将达到1976元，人平330元，同队农户许清朋、许胜安、简道华也是类似的经营方法。

有的农户利用方便的交通运输和场镇市场，发展加工业、商业和运输业。如小河坝大队三队旷秀珍，利用靠省道公路、离安居坝场镇很近等条件，编织篾席和加工皮蛋，逢场上市出售，82年人平收入325元；乌木厅大队三队何友贵利用同样条件做豆腐出售，82年收入900元，计划83年增加到1100元；凤凰湾大队二队许清朋，家处安居坝场镇边，过往行人很多，他82年经营推销店，收入400多元，今年又与4户人联营办起一个小食店，每月毛收入在1000元上下，除去成本、税收，人平可收入50至70元。

一些农户在某些项目上重点突出，已经初步分业，形成了专业生产的雏型。1982年，全社有5户农户单项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主要是打鱼、养猪、机械修理、工匠、种植蘑菇、农副业加工方面，还有3户农户没有承包耕地，已经离开土地专门从事某些单项生产。如小河坝大队七队蔡立秀，全家5人中2人打鱼，82年收入3000元，占总收入5186元的57.86%；书院沟大队一队杨世明，全家2人，82年搞修理收入1300元，占总收入2061.70元的63.05%，计划83年这项收入增加到1500元；同队农户詹正举，爱人是退休教师，她没有承包土地，主要种植蘑菇，82年收入1010.86元，育肥1头肥猪收入125元，共计1135.86元，计划83年种菇收入1200元，出售1头肥猪收入150元，共计1350元。

除此而外，我们还发现，人平收入高的户家庭人口都比较少，全社88户农户中，家庭人口在5人以下的户就有63户，占71.59%，3人以下的26户，约占30%，无论是82年的实绩，还是83年的计划，人平总收入千元以上的户家庭人口都在5人以下。82年人平收入上千元的6户人中，其中有4户是单个子人，1983年收入上千元的14户，3口人以下的家庭就有10户，全社人平收入最高的

两户（人平 2000 元左右）都是独身一人。

## 二

这次调查，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安居坝公社同全国全县一样，通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落实各项农村政策，已经打破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农业已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小而专”的经营方式也开始出现。如打鱼、养猪、养鸡、加工等，已逐步成为某些农户的主业，并出现了象许清朋、吕治民等户的新的经济联合。这批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户尝到了新政策给他们带来的甜头，并且有了一定的剩余劳力和资金，党的十二大又给了他们“定心汤元”，不少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在致富路上迈开更大的步伐，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农村的未来和希望，只要我们因势利导，正确看待“两户”目前所处的地位和发展中的问题，做好真心实意的鼓励和扶持工作，我们就一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县农村一定会尽快达到繁荣和昌盛。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一些看法。

（一）目前对“两户”的数量和发展水平估计不能过高，他们的生产水平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农民本身也需要解放思想

安居坝公社农业生产属我县的中等偏上水平，初步掌握，83 年人平收入 500 元以上的“两户”只有 83 户，仅占全社总农户的 2.4%，如果加上比较明显而未统计上的 20 多户富裕户，也只占总农户的 3%左右，并且这 88 户中，82 年有 34 户人平收入在 500 元以下，最少的不到 300 元，从家庭发展计划上看，83 年仍有 10 户人平收入不足 500 元（注：我们掌握的数据可能偏低）。这些户分工分业也才刚刚迈步，程度较低，他们已经成为重点户，但还基本上没有形成专业户，83 户中只有 5 户单项收入达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绝大部分农户目前还处在兼业阶段，除了三户独人户外，其他农户没有离开土地，他们离真正富裕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认为，各级领导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农村挣脱“左”倾思想的束缚时间还不长，就普遍而言，才刚刚摆脱贫困状态，要真正达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我们还要做许多引导工作和组织工作。一方面要看到以一业为主的专业户、重点户是发展趋势，是农村的希望，在工作中对确定不宜再承包

耕地的农户要允许他们退地，专心致志地从事专业生产；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农户应教育，帮助他们百倍珍惜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宝贵土地，运用传统的生产手段加上现代的科学技术，经营好责任地、自留地和荒山、空地，特别是还没有利用起来利用不好的生产资料，从中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注意不要只图外出找“松活钱”，造成土地荒废或薄收。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这两年随着责任制的落实，农村生产发展了，农民的温饱已经得到解决，一些农户特别是中、老年农民产生了满足思想，认为几千年来就是追求有饭吃、有衣穿的目标，现在已经达到了，差不多了；对如何发挥优势，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商品生产，增加现金收入，想得少，心中无数；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习惯势力在农民中影响较深，加上处于半封闭状态，大多数农民见的世面少，文化、科学水平低，思想不够开化，想的路子很窄；对农村致富，一些人还有畏难情绪，如像上级号召每个农户制定家庭致富规划，不少人一筹莫展，有的说，掇泥巴的富得起哪里？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农民“怕政策变”，对农业的快速发展有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宣传工作的深入，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现在，影响生产发展的因素还有以上一些方面，因此，需要各级党政组织在宣传政策的同时，把工作做深入一步，引导广大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打开视野，克服畏难情绪，反对固步自封，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还要注意抓好农村的教育和科技普及工作，使农民增添更多的驾驭自然、增产增收的本领。

## （二）建立干部联系重点户、专业户制度，扶持“两户”健康发展

农业经济建设是我县、区、社的主要任务，我县农民要尽快富裕，必须狠抓“两户”引路。除了党员、干部、团员要带头致富，为群众作出表率外，各级党政组织应将对重点户、专业户的扶持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将干部联系“两户”作为制度来制定和推行，制度制定后，要经常检查、督促、抓落实，不要流于形式，党的干部首先要清除“左”的影响，理直气壮地鼓励农民走向富裕。要经常帮助他们解决良种、资金、技术、病害防治、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困难，为他们出谋划策，提供市场信息，创造一些发展条件，同时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只有党员、干部家庭本身带好头，加上始终抓住“两户”引路不放，我县农村经济才会有更新的局面。

联系到干部负责抓“两户”制度，我们认为区、社行政干部目前的工作方式

和工作方法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大适应，需要认真研究，加以改善。安居坝公社在我们调查期间，面对 82 年农商合同兑现、计划生育宣传月、清理乱占耕地建房、乱砍林木，以及小春田管等多项工作，一改过去的老方法，把全体脱产干部分成几个小组，分别由负责同志带领，各抓一项，效果较好，值得推广。区、社脱产干部采取一个大队一个干部的“老鸦守摊”的办法是过去集体生产搞“大伙营”时期的产物，弊端不少，脱产干部都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往往注意了一个大队而忽视了面上，加上会议很多，忙于开会、传达、再开会、再传达，深入的时间少；近两年，干部队伍新老交替较多，工作能力强弱不等，有的就当不了一个大队的参谋；还有的同志不是党员，说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不便过问党支部的工作，也直接影响工作的开展。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后，有的干部认为无事可做，有的下去发现了问题又无法解决。个别自觉性差的干部，甚至长时间不下大队，下去以后，也是走马观花，工作很不负责，基层干部和群众颇有怨言，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解决。我们认为，农村工作主要应注意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脱产干部特别是新干部需要训练，在公社政社未分设前，对脱产干部可以采取集中分组使用，这有利于以老带新，有利于工作的落实，工作效率会更高，上下级的关系也会有所改善。

### （三）注意保护“两户”的合法利益

我县的“两户”才刚刚出现，目前他们的生产水平较低下，发展也还有不少困难，从调查中和平时听到的一些反映来看，我们认为我们的宣传要力求实事求是，对他们的要求要从实际出发，并且应注意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鼓励、提倡他们扶贫助困，帮助“三缺户”发展生产是对的，作为新中国的公民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和风格，但是不要求全责备，对别人的支援一般应是有偿的，无偿支援应出自本人自愿。目前，农村中“恨人富、爱人穷”的旧习惯还有市场，平均主义思想还在作祟，要同这种旧思想旧行为作斗争，十分注意保护“两户”的积极性。干部的扶持应是实实在在的，比如，搞活经济需要时间，要保证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生产，通知开会，介绍经验就不要太多。

### （四）认真宣传人口少的家庭也能富的事例，继续抓好计划生育

农村致富，人多地少是一大困难，但是，当前还有不少有人认为“人多劳力强才能富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计划生育的开展。我们要向群众讲清楚，人

口少的家庭也能富裕，并且有可能首先富裕起来，这在安居坝公社已有例证。各地应大力宣传本地这方面的典型，破除只有人口多、劳力强才能富裕的片面观点，以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只有计划生育工作搞好了，我县农民的生活才能达到小康水平。

中共遂宁县委办公室

傅定国 李劲

---

发：各区委，县委各部委，县府各委办，有关局；

---

送：县委、县府、人大各领导。

附件二：

---

我们乡是怎样开展村级整党工作的

中共决山乡党委

同志们：

根据市委、市中区委整党工作指导小组的安排，我们乡的村级整党工作先走了一步，作为整党试点，为面上的村级整党工作摸索经验。试点工作于七月一日拉开，八月九日告一段落。现在，我代表中共决山乡党委分三个问题向同志们介

绍乡村级整党工作试点的情况，即：基本情况、基本作法、如何解决整党中一些具体问题，重点放在第二和第三个问题。希望能给同志们一些启发。

### 基本情况

我们乡共有九个村级支部，四十二个党小组，一百九十一名党员，除一名党员已在原工作单位参加整党外，应参加整党的党员为一百九十名，实际参加整党的一百八十八名，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两名在外务工经商的党员未参加整党，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一。整党学习阶段，吸收建党积极分子二十六人参加学习、讨论。整党结束后，通过整党验收，九个支部的整党工作全部合格，其中整党工作较为出色的有八个支部，参加整党的一百八十八名党员全部予以登记。

通过整党，全乡党员在政治思想觉悟方面、党性观念方面、组织纪律方面、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确实较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好的变化，整党的成果是显著的。在这些方面我乡党员中涌现出了许多生动的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我相信，同志们回去后通过扎实的整党工作，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的。

### 基本作法

我们乡村级整党工作具体是怎样搞的呢？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抓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一）集中人员，保证有足够的力量领导村级整党

农村党员居住分散，农活又多，不象机关单位整党容易在时间上得到保证，要求乡党委在组织领导整党时有足够的力量。为此，我们让全乡所有的党员干部九名不再担负其他工作，全力以赴参加整党，会同市、区、处抽调的联络员组成整党联络员小组，派驻各村开展工作，非党员干部则由乡长牵头，组织了抓经济工作的班子，负责处理除整党工作外的其它日常事务。

抓整党和经济工作的两套班子建是建立起来了，但在后来的工作中却形成了一套班子既抓整党又抓经济工作的局面。为什么呢？因为抓经济工作这套班子中的非党员干部多是“八大员”，他们或直接听命于市中区各有关职能部门，或由办事处统一管理，他们本身担负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并时常参加他那个系统组织的专业会议或突击性工作，使这套班子在家的人员所剩无几，还有这些非党员干

部一般素质较差，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到村、队开展工作困难较大。故此，非经济工作这套班子实际上名存实亡，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干脆实行一套班子既抓整党又抓经济工作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没有一项工作留下了后遗症，比如小春粮油入库，整党学习开始时，我们乡入库进度在三家办事处倒数第一，学习阶段，我们利用整党空隙，要求所有党员逐户动员群众，加快入库进度，十天后，整党学习结束，小春粮油入库数量也跃居办事处第三。

乡党委领导村级整党，是建立两套班子好，还是建立一套班子好，我们认为要依本乡的实际情况来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论建立几套班子都必须保证有足够的力量领导村级整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 （二）及早作好整党前的准备，拟定出详尽的整党日程安排

要保证村级整党的质量，必须做好整党前的准备工作，我们乡七月一号正式开始整党，但我们于六月中旬就着手抓了整党前的准备工作。一项准备工作是通知外出务工经商党员回乡参加整党。我们乡在外务工经商的党员有二十名，我们以乡党委的名义发电报、写信通知他们回乡参加整党，及时赶回的有九名，整党后陆续回乡的又有七名。第二项准备工作是开展“三会一训”，培训整党骨干。

“三会”就是联络员会、村支部支委扩大会、广播会，“一训”就是对村支委一班人进行培训。通过“三会一训”学习整党文件，使大家明确村级整党的目的、任务、方法等，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第三项准备工作是开展四个清理，找准党支部和党员中存在的问题。四个清理就是党员非法占用集体资金清理、非法占用集体财物清理、乱占或多占耕地建房清理、超生子女问题清理等。通过清理，我们认为我乡党组织和党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党员挪欠款较多；党员的党性观念淡漠，组织纪律差；在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不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差，不同程度的存在软、懒现象。”找准了问题，为在整党中集中力量，重点解决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整党日程安排，我们把整党的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学习整党文件阶段，对照检查与整改阶段，组织处理与党员登记阶段，并把每个阶段用多少时间整党，哪一天干什么，是以乡集中还是以村集中，由谁主持，打印成表格，发到各村支部，提前通知各支部和所有党员，这样一来，党员家里的家务农活就可以有计划的在没有安排整党的时间里尽量完

成，为较为妥善地解决整党与生产在时间上的矛盾创造了条件。同时，党员们也好消化整党文件精神，作好下一步整党工作的思想准备。

### （三）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思想教育，努力提高党员的认识

学习整党文件阶段，我们把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作为重点，着重提高他们对整党的认识，统一对农村经济形势和党的改革政策的认识，增强党性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增强法制观念等。为此，我们采取了以下四种形式进行思想教育。

一是学。即学完每个阶段所规定的整党文件、材料。方法上将乡集中讲课与各村分散学习、讨论相结合。集中讲课，以通读文件，全面理解文件为主，各村分散的学习、讨论，则针对准备阶段所掌握的存在的问题，重点选读、精读有关章节，边学边讨论提高认识。

二是讲。一是以乡为单位集中作好整党动员，讲好理想宗旨，农村经济形势和农村政策，民主与法制三课。二是请本乡的优秀党员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如请河沟村二组党小组长唐志斌讲如何发挥农村党小组的作用，带领群众治穷致富的事迹；请土地村原支书吴有乾结合自己讲如何增强党性观念，做一个合格党员的问题。第一种方式所讲的内容让党员们懂得了一些理论，后一种方式则把理论转变为形象、生动地事例，让党员们看得见，摸得着，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三是看。一是以村为单位集中组织到河沟村二组参观，实地学习该党小组带领群众发展商品生产的经验。二是以乡集中组织党员观看两山英模报告和曲啸演讲报告的录像。

四是查。即通过学、听、看，广大党员联系自己的实际开展互查。一查思想，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得怎样。二查党风，看抵制不正之风做得怎样。三查作风，看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怎样。四查纪律，看党群关系和廉洁奉公做得怎样。五查组织观念，看“三会一课”和思想汇报坚持得怎样。通过查、看人家比自己，找差距寻根源。

实践的结果表明：学、讲、看、查四种方式的思想教育收效是好的，又特别是查。通过自查、互查，使党员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 （四）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保证对照检查不走过场

我们认为，对照检查是整党的关键环节，因为只有对照检查搞好了，才能全面、准确地总结成绩，同时把存在的问题说透，辩明是非，找到差距，明确进取

的方向，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否则，前面的工作做得再好，也都是白费功夫，达不到整党的目的。

我们乡搞好对照检查首先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在整党的准备阶段通过摸底调查，较为准确地掌握了党支部和党员中存在的问题，做到了心中有数，为在对照检查中引导党员大胆地自己解剖自己，预防敷衍应付走过场打下了基础。这里所说的引导，就是党员有问题不说，我们采取恰当的方式委婉地指出来，你不说，非要你说，还要说清楚，是非问题上决不留情面。

其次，消除广大党员的思想顾虑，端正对照检查的态度，我们认为这是搞好对照检查的关键所在。针对一些党员“面朝黄土背朝天，没什么整头”的错误认识、少数在经济上挪欠、无计划生育的党员等着挨“整”的消极情绪，我们认真抓了思想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反复向党员们讲清道理，提高他们对搞好对照检查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对个别仍有顾虑的党员，我们采取个别谈心的方式，做耐心细致的帮、教工作。如石碛村六队队长田昌谷七一年整党勇于承认错误和缺点，反而被罚去担了十多天的堰塘泥。他认为应吸取这个教训，在整党中少说话。我们了解到他有这样的思想情绪后，就与他个别谈心，帮助他消除了顾虑，对照检查中，他不但实事求是地检查了自己，还积极给支部和其他党员提了批评意见和建议。

再次，要求支部领导带头给党员们做好表率。村支部支委一班人带头检查，敢于亮思想、讲真话，不回避问题，做出榜样，是解决党员思想顾虑的另一种好方法，党员们一看支委们都没有怕的思想，心想我们又怕什么？于是，心里头的顾虑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

最后，是实事求是，搞好民主评议。各村支部集体和个人的对照检查，都以《党章》和《准则》为标准进行认真评议，有的支部的集体对照检查反复多次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每次都作了新的修改，直到党员们不但同意，而且满意。通过评议，找到了差距，总结了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规划。

#### （五）结合整改，调整和充实党支部和群团组织的领导班子

整党前，我们九个农村支部中，有两个村支部只有支书一人，没有支委，还有两个支部的支书是代理的，存在着不够充实和健全的问题。为此，我们结合支

部的换届选举，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对村支部班子进行了调整。我们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在此基础上产生支委候选人，并让党员们充分酝酿，再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差额选举。新的支委产生出来后，我们首先进行了分工，然后建立了岗位责任制，支委一班人集体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恢复和健全了“三会一课”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抓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我们对二十六名建党积极分子进行了考查，最后决定在十七名写了入党申请书的积极分子中发展新党员六名。

在调整和充实党支部领导班子发展新党员的同时，我们对共青团妇联和民兵组织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一次调整。原来这三个班子中主要存在老化，文化偏低，工作能力和思想状况均已落后于工作实际的问题，我们对症下药，选拔了一批德才条件较好，年纪轻，文化水平较高的新人进入了这三个班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改变以前那种工作停滞不前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六）严格检查验收，保证整党质量

为了确保整党质量，使整党不走过场，我们在每个整党阶段结束后，都进行一次规模不等的检查验收。方法上主要是听各村支部汇报，个别走访党员，听开展工作的步骤、方法，解决了什么问题，有何收获等情况。这样，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采取补救措施进行弥补。比如，高坎村支部在对照检查阶段认为，整个支部只有九名党员，且有近半的退休职工，没什么大的问题。因此，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搞完了对照检查，做得草率了一些，问题没有说透，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以研究制订整改措施的方式，重新进行了一次对照检查，补好了这一课。

整党的全过程结束以后，我们集中人员三十人，分成九个组，对全乡的整党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交叉检查验收。采用的方法是：一听二看三座谈。一听就是听支部的整党工作情况汇报；二看就是看党员考勤、学习讨论记录；三座谈就是开好规模不等的座谈会，听取党内外群众对这次整党的看法、意见。座谈的内容主要有这么五个方面。（一）各个阶段的整党工作是不是按要求搞了，支部集体和党员个人问题是不是找准了；（二）存在的问题诸如不正之风是不是纠正了，非法占有集体的财物、超占土地、超生子女问题是不是处理了；（三）党员的党性观念是否加强了，带领群众发展商品经济的决心是否坚定了，措施是否得力了；（四）支部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建立起来，战斗堡垒作用加强没有；（五）（86）

1号文件贯彻得怎样，与国家签订的各种合同是否执行了。通过全面的检查验收，全乡九个支部的整党工作基本上符合验收标准，全部合格。

### 如何解决整党中一些具体问题

第一，是如何提高党员对整党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问题

要把整党工作变为党员自觉自愿的行动，其关键就在于使他们充分地认识到整党的重要性、必要性。整党的准备阶段，我们通过摸底调查发现党员们的思想状况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存在着怕“整”的思想，有这种思想的党员一般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而且在那里明摆着，自己也知道不在整党中说个明白肯定过不了关，但又不清楚这次整党一些具体的方法、政策，对过去搞群众斗争心有余悸。这种类型的党员是少数。一种是等待观望的情绪。有这种思想情绪的党员多存在一般性的问题，或存在一定的问题，认为其他人可能不知道，对整党抱侥幸心理，想马虎敷衍应付了事。这种类型的党员仍然是少数。一种是抱无所谓的态度，你那么说我那么好。抱这种态度的党员一般自认为没什么值得整的，不整也是这么回事，整也是这么回事，整不到自己头上来。这种类型的党员是多数。针对这三种思想状况，我们研究了一些办法区别对待，对有怕“整”思想的党员，我们主要采取个别谈心的方式，给他们讲清这次整党与以往整党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搞群众斗争、扩大化，重在自我教育和今后的整改行动等，消除怕“整”顾虑，同时讲清存在的问题对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危害，提高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勇气和自觉性。对有等待观望情绪的党员，我们事先就力求掌握他们的问题的真正所在，并从不同的侧面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在整党中，加强引导，关于如何引导，我在前面也介绍给同志们，这里就不重复了。对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多数党员，一方面我们在学习文件阶段，通过一学二讲三看四查，让每个党员都对照《党章》《准则》找不足，与先进党员量差距，看清楚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有意识的点出一些现象，如党性观念不强，纪律性差，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得不够，存在欠款，无计划生育问题等，让党员们认真思考，从而触动了一些人麻木不仁的思想。这些办法是否对头，解不解决问题，开始我们心中也没有数，现在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还是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第二，是如何解决农村党员整党与生产在时间上的矛盾问题

我们乡在整党期间，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蕃茄已进入了成熟期。今年，我们乡蕃茄的种植量较大，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植，收获量达四百多万斤，成熟盛期，一亩地一天就可以采摘满满的一挑，不及时采摘就要落在地里很快腐烂，采摘了的必须及时交售，由于罐头厂的收购点只有两个，交售蕃茄的人从早上四、五点就开始排队，直到晚上十二点才能扫尾。因此，我们乡在整党期间，实际上是农忙，整党与生产在时间上的矛盾很突出。整党前，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预先作出了详尽的整党日程安排，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党员们有计划地在没有安排整党的时间先搞好生产，前面我也提到了这一点。同时，我们加强了党员自觉参加整党的教育，尽可能地把纪律约束变为党员的自觉行动，这样，发挥了党员们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想了很多办法保证整党时间，这些方法一是时间“挤”，就是一有空隙就挤时间搞生产；二是家属“勤”，就是做好家属的工作，让他们多承担一些生产和家务，自己安心整党；三是亲友“帮”。就是家中除了自己再没有劳力，就请亲戚或朋友来帮忙；四是群众“助”。就是群众主动地帮助党员家庭搞生产，支持党员参加整党。这方面的事例，市中区委整党办的《整党简报》第三期已经作了反映。总之，我们乡不但比较圆满地开展了整党工作，而且也保证了生产的正常发展。整党期间，四百多万斤蕃茄基本上交售完毕，还不误农时的搞了水稻治虫、秋红苕栽插、除草等。

### 第三，是如何解决外出党员的整党问题

对外出党员的整党问题很棘手，我们也还没有研究出一套“包打汤元不散”的办法来。对外出党员，我们首先是查明他们的地址，通知他们回乡参加整党，先后回乡的党员有十六名，其中整党前就赶回来的九名，整党期间陆续回来七名，对后回来这七名党员，我们本着缺多少补多少的原则，对他们补了课，余下还有四名外出党员没有回乡，我们采取走出去的办法，又解决了两名党员的整党问题。如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在三家场女儿家里养病，行走不便，因为距离不远，我们派了两人去补了课，我们认为，对确实困难不能回乡的党员，如果距离不远，比如在中区或办事处范围内，可派人去补课。如果距离远，如外省，但党员人数多如达十个或十个以上，居住又集中，仍可派人前去补课组织他们整党。全乡还有两名党员既未回来又未给他们补课，估计他们春节要回来，我们准备以乡集中组织他们学习整党文件，时间四天，对照检查与登记由村支部组织，各三天，

一共十天补完课。当然，如果对有问题的党员，时间安排上自然例外。归结起来，我们乡解决外出党员整党的问题，有通知回来，走出去补课，春节补课三种方式。

#### 第四，是如何解决农村党员文化水平低，填写党员登记表有困难的问题

农村党员文化水平较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文化水平低，在整党中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一是他们在整党学习讨论中往往词不达意，条理紊乱，甚至不着边际，东拉西扯，写的收获体会，三、五句话后就再也不晓得说什么了；二是书写很不规范，有的难以辨认。对第一种情况，我们耐心引导他们开阔思路，即使他们还说不透，写不对，我们也不作过高要求，不认为他们是理解不深，认识不明。对第二种情况，我们采取每个人自己写草稿，由各村选出三、五个文化水平较高，书写较为工整的党员统一填写党员登记表的办法，作了解决。

#### 第五，是对有挪欠款的党员如何处理的问题

我们乡村级党组织和党员中，除较普遍地存在党性党纪、理想宗旨观念差的问题外，主要存在党员挪欠款问题。全乡有挪欠款的党员三十二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七，挪欠款总数达四千五百一十五元三角三分，对这些有挪欠款的党员，我们分别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说清这些问题对党的形象、党的威信、党群关系的危害，动员他们还清挪欠，方法上不搞斗争，不滥施压力，同时，向他们讲清党的纪律，讲清个别情节严重、影响很坏的必须作出严肃处理的政策，严格要求他们，要他们作为整改的实际行为定期退赔。到八月六日止，全乡三十二名有挪欠的党员都退了挪欠款，退款金额占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七，没有退的部分均因家庭困难，确无能力退赔，但也已订出了退款计划。因此，我们乡有挪欠款的党员都登了记，也没有一个受组织处理，党员们的经济退赔做得好，我们向群众广泛宣传，并以此号召有挪欠款的群众积极主动的退赔，结果，全乡九十五名有挪欠款的群众中，有七十四名退款一万一千零六十七元，占应退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六。

#### 第六，是如何解决党员整党的误工补贴问题

以前，我们党员过组织生活都由乡党委发了误工补贴八角，这次整党，我们却没有发任何补助。我们是怎样说服党员们不要补贴的呢？首先，讲党性原则，党的纪律，重在明白道理。我们指出，以往我们给误工补贴是组织对每个党员的照顾，但是，从党的纪律角度来讲，党员应无条件的参加党的活动，谁违背了谁

就不是一个合格党员。其次，是算好一笔帐，即这次整党时间占用得多，如要发误工费补贴，一下就是好几千元，乡党委也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来，到头来还得在农民头上出，增加农民负担。道理讲清了后，党员们说，从党纪上讲我们不该要补贴，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不能要补贴，对乡党委不发误工费补贴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有的党员说现在党的政策好，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这种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很难得，拿钱买还买不来，要什么补助啊！在党员们的模范行动影响下，我们乡群团组织的整顿，也没有发一分钱的补助。

我们乡在村级整党工作中所做的就这么多，遗憾的是，在把中央和省委有关违纪党员的组织处理的政策具体化上，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来，这里有一个客观情况，就是我们乡党员虽存在一些违纪问题，但都是一般性的，加上整党中检查较好，整改行动积极，我们认为都够登记的条件，因此，实践中失去了对象，我们又不能主观臆断，只好作为一个问题留下来了。

我们乡的村级整党试点工作受到了市委和市中区委的大力支持，市、区、处三级共抽调了二十一名联络员到我们乡，配合我们工作，给我们减轻了很多工作量，市中区委的领导同志也多次来决山听取汇报，精心指导工作，利用这个机会，我代表中共决山乡党委向他们表示感谢！

### 附件三：

四川省村级整党经验

交流会发言材料

我们在村级整党试点中对党员教育的

几点做法

中共遂宁市市中区委整党办公室

加强对农村党员思想教育，是这次村级整党的重要内容。我们在决山乡村级整党试点中，把对农村党员的教育贯彻始终，收到了好的效果，为指导我区面上的村级整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找准存在问题 确定教育重点

认真分析农村党员的思想状况，找准他们在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才能在教育中有的放矢，收到好的效果。决山乡九个村党支部、一百八十八名党员的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状况如何呢？对此，我们在整党的准备阶段就着手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他们当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党的改革政策缺乏正确的、全面的理解。小农思想仍有很大市场，迈不开发展商品生产的步子。由于千百年来形成的小生产观念的束缚，不少党员仍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而在思想认识上表现为对农村第二步改革中一些政策不理解、不接受。比如，不少党员认为农副产品由统购统销改为合同订购是换汤不换药、是愚民政策，对农业税附加、教育费附加，认为是不合理摊派，是增加农民负担等等，对党的政策缺乏系统的、全面的认识，因而在行动上跳不出小农经济的圈子，对发展商品经济信心不足，办法不多，比如有的党员种果怕被人偷，养鱼怕下泼大雨冲走，怕这怕那，更不要说经商、办企业了。因此，这个乡至今人均总收入仅三百元多一点，极个别人均总收入较高的党员（如一村

的黄尚富)家庭也不过千元左右。

(二)党性观念淡漠、纪律松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差。少数党员认为当党员“吃亏”,从而滋生了“吃饭花钱凭力气,不当党员没关系”,“田土包了产,不用干部管,责任到了户,不要党支部”等错误认识,纪律松弛,不参加党的活动,不发挥党员作用,有的甚至落后于群众,参与迷信、赌博活动,无计划生育,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党支部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软、散问题,党内生活制度不健全,有的党支部多年未组织党员过组织生活,支部班子不团结,不能发挥集体的作用,支部书记说了算,有的支部虽然想把工作干好,但由于不适应新的形势,觉得“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开创不了新局面,没给群众办什么实事,就经济工作来讲,结构仍然单一,仍在传统农业内徘徊,二、三产业还处在起步状态,没有大的突破。

此外,这个乡村级党组织和党员虽然因离城较远,经济不发达(几乎没有乡镇企业)而基本上不存在严重的以权谋私和违法乱纪问题,但挪欠款的问题却较普遍。全乡有挪欠款的党员三十二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七,挪欠款总数达四千五百一十五元三角三分,有的挪欠款长达二十多年,群众反映强烈,对这次整党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均拭目以待。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乡党员存在的这些问题,首要的是通过扎扎实实的教育去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树立商品经济观念,增强党性观念的问题,其核心又是,破除小农经济观念,牢固地树立商品经济思想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指委强调指出的整党工作要“有利于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进一步搞活,有利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这一目的。为此,我们把这一内容作为对党员思想教育的重点,着重在学习整党文件阶段抓扎实。在时间上,我们也把这个阶段安排充足了些,用了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占村级整党时间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 教育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灵活

针对党员存在的思想问题,使教育内容丰富充实,教育形式灵活多样,并努力做到两者的协调统一,是增强对农村党员教育的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一)采取讲课的方式,抓好理论教育。

为了消除农村党员头脑中的小农思想，树立商品经济的新观念，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时期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主要集中讲好农村经济形势和农村政策、理想与宗旨、党的干部与党的纪律、民主与法制四课，重点放在第一课上。

听课以后，很多党员改变了以前对党的政策的片面看法。比如对合同订购，他们认为有“甲乙双方经营自主，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价格稳定优惠；产前订好合同，防止了生产的盲目性”三大好处，确实比统购统销好。一村党支书黄才川，八三年贷款外出搞运输，但经营无方亏了本，同时又耽误了支部的工作，他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不该出去“跑生意”，课上我们解剖了这一问题，使党员认识到：错不在出去“跑生意”，而是没有合理地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党的工作的关系，澄清了是非，解放了思想，在思想上明确了农村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

理论课大开了党员的眼界，激发了他们自觉、踊跃的参加学习的热情。他们说，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们既明确了许多道理，又纠正了我们以前一些错误的看法，这样的学习机会太难得，特别是一些老党员深有感触的说：历史上这么大大次整党，只有这次抓党员教育抓得好，使我们在认识上真正得到了提高。在朝鲜战场上被炮弹震聋耳朵的五村老党员陈前明，为了能一字一句的听清讲课的内容，每次讲课都坐在最前面，一动不动地听，没听清楚的课后又问，直到完全弄懂、搞清楚。四村党员龚发元，在部队服役期间为军政委开小车，有一手过硬的驾驶和修理技术，复员后，在三家供销社车队修理汽车，月收入上百元，回村参加学习后，他说，我复员这么多年，由于党组织活动没有经常开展，很难受到这样一次全面的教育，我无论如何要参加，虽然要因此减少经济收入，但是，共产党员不能只想到钱。

## （二）采取听、看的方式，抓好形象教育。

只讲理论，未免空洞，特别是农村党员文化水平低，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必须辅之以直观具体、形象生动的典型教育，让党员们看得见、摸得着，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我们的形象教育，一是听，即听本乡的先进模范人物作经验介绍，现身说法进行教育。如请三村二组党小组长唐志斌讲如何发挥党小组的作用，带头和带领群众治穷致富的事迹；请四村原支书吴有乾结合自己在支书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

因病离任后仍不忘自己的责任，对新任支书搞好传、帮、带的事迹，讲如何增强党性观念，做合格党员的问题；同时将熊声全把本村一个五保老人接进自己家里供养了六年和焦广军坚持六年义务为五保老人，烈军属送药送医的先进事迹作广泛宣传。二是看，即组织党员观看两山英模报告和曲啸演讲报告的录像，到三村二组参观，实地学习该党小组带领群众发展商品生产的经验。通过听、看，广大党员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明确了努力的方向，他们觉得：党员要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自己必须先创出条路子来，人家三村二组种果、养鱼、养桑、种菇，经济搞得那么活，开始富起来，我们还在原地踏步，关键是我们怕这怕那，归根结底是怕困难，怕吃苦。党员田习良听了介绍，看了录像后说：以前认为共产主义是空中楼阁与我们无缘，现在，我懂得了要实现这个理想，虽然要走很长一段路，但是，只要我们像爬楼梯一样，不停地爬下去，总有一天要到达目的地，我父亲那一代住的是茅草房，现在我这一代住的是砖瓦房，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住进楼房，如此下去，我们不是在走向共产主义么？党员蒋兴富整党前不做工作，不关心群众疾苦，表现自私自利，群众在他身上看不到党员的影子，认为象他这样的人不配作党员，整党开始后，他认识提高了，行动上变化很大，经常主动向村民组长要求做一些工作，比如逐户动员群众加快小春粮食入库进度等，党内有什么精神，能够传达的也主动给村民组长通气，向群众宣传，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他们说“整党硬是见效！”

### （三）开展议、查，深化教育。

议，即广大党员联系自己的实际，看人家比自己，讲体会谈认识。查，一查思想，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得怎样；二查党风，看抵制不正之风做得怎样；三查作风，看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怎样；四查纪律，看党群关系和廉政奉公做得怎样；五查组织观念，看“三会一课”和思想汇报坚持得怎样，看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是否得到了提高。议、查的重点仍然放在为什么自己没有富裕起来，没给群众做出榜样的问题上。很多党员认识到：我们以前想富觉得无门路，根源是看不利因素多了，总认为交通不便，地处偏僻，困难很多，对富裕起来没有信心，结果对怎样致富想都不敢想，有得过且过的思想，现在明白了，要想收获得多，不付出辛劳和汗水是不行的。对照八村党员焦广军复员后坚持六年为烈军属免费治病，定期为卧床不起的五保老人姜赵氏和姜文秀送药上门，亲自为她们烧开水，

照顾她们服药的先进事迹, 党员们认为: 焦广军能办得到, 关键是他心中有党的观念, 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正是我们与他的差距所在。通过议、查, 使党员对自己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为边整边改打下了基础。

#### (四) 开展谈心活动, 抓后进党员的思想教育。

在进行以上三个教育的同时, 我们还穿插进行了个别的谈心活动, 与一些思想问题比较大的后进党员个别交换意见, 摸准思想根源, 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一村支部为了加快本村的发展速度, 经过反复研究, 决定重新使用大集体时遗留下来的一个砖瓦窑, 烧砖烧瓦, 既满足群众建房的需求, 又增加村里的经济收入。方案提出来后, 家住窑前的党员杨民珍认为烧窑烧了她家的风水, 不让群众烧窑。针对这个思想根子, 联络员反复向她讲科学道理, 要她信科学不要信迷信。通过做工作, 她终于转变了思想, 在支部大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认识, 查了根源, 表示支持支部的决定。七村党员曾庆祝在实行包干到户时买了集体的一辆汽车跑运销, 但由于不能正确对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欠款七百元至今未付, 整党中又害怕追究此事, 挨“整”, 故不参加整党。联络员上门向他宣讲这次整党不搞群众斗争, 坚持自我教育为主的方针, 要他回村支部参加整党。对照检查阶段, 他勉强地来了, 遮遮掩掩地作了检查, 退了三百五十元欠款。但是, 我们从他的检查中发现, 他还没有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 还有私字作怪, 果不其然, 第二天他又不辞而别, 开他的汽车去了。联络员又五次登门, 讲党的纪律, 讲党员应该带头执行党的三兼顾原则的道理, 同时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只顾自己富, 不要集体, 想据公为私的错误,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坚持这一错误的严重后果, 从正反两个方面去促他, 最后, 他幡然醒悟, 在支部会上再次作了检查, 补交了欠款余额。深入细致地思想教育, 促进了后进党员向好的方面转化, 使其他党员在这些反面典型中也受到了教育。

#### 切实抓好整改 巩固教育效果

我们一手抓党员的思想教育, 一手抓整改, 使党员在整改中进一步接受教育, 巩固教育效果。一是抓发展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规划。针对发展商品经济思想保守, 步子迈得不大的问题, 各村支部都发动党员认真讨论, 制定本村经济长远

发展规划，研究短期的工作安排，有目标、有措施，落实到种养殖品种上。一村支部把黄桃、番茄、家畜和家禽的种、养殖作为发展重点，若能实现计划，八七年人均总收入可达四百四十五元，比今年增收六十四元。五村支部在经济增收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七五期间组组通公路、户户亮电灯、家家响喇叭的目标。群众说“村支部这样抓工作，我们心里有底了。”二是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针对党员党性观念淡漠，组织纪律性不强的问题，各村恢复和健全了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每月一次党小组活动，一次支委会，每季度一次支部大会，过民主生活，解决党内问题，研究布置工作；针对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建立了支部集体岗位责任制和集体负责与个人分工负责制；针对挪欠款较多的问题，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三是认真清退了挪欠款，全乡三十二名有挪欠的党员都退了挪欠款，金额达四千三百六十五元三角三分，占应退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七。没有退的部分均因家庭困难，确无能力退赔，但也定出了退款计划。四是为群众办实事。“要想富，先修路”，这个乡村村都通小公路，但年久失修，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烂，整党期间，各村组织党员分段包干，整平加宽加固共三十五华里；八村支部花了半天时间，排通了村小学后面的水沟，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下雨教室就被淹的问题；五村由支部牵头，向群众集资，修起了石桥两座，行路不再困难了；九村应群众的要求，集资五千五百多元，全村党员义务劳动四天，更新了全村的广播设施。这些扎扎实实的整改行动，让群众看了拍手称好，党员自己也在这其中进一步看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找到了行动上努力的方向、进取的目标。

一九八六年十月

## 逐渐淡出生活的信封和旧的邮寄方式

### 谭清友

1976年，我遂宁师校毕业后，便分配在师校附小教书。

那时的教师生活十分枯燥，除了繁忙的教育教学之外，文化娱乐时间很少，

偶尔学校组织师生看一场电影，算是最大的娱乐了。学校有一台电视机，也不常放，节假日放一次，一个屋子里挤满了人，也看不舒服。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突然爱上了写作，用写作来打发空闲时光，这也算是我找到了一份精神寄托。傍晚下班后，吃了晚饭，便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熬夜，爬格子，把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变成咏叹，从这些分行的句子中找到一丝满足和愉悦。

稿子写好后，自然会萌生投稿发表的念头。要投稿，首先得把作品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笺上，然后装进长方形的信封里，再写上报刊杂志的地址，最后赶到邮局投递出去。投寄出去后，便是漫长的等待，按报刊杂志的规矩，投稿后一般要等待三个月，有的甚至更久。

我的第一篇作品用信封贴邮票投寄并刊登在公开出版刊物的是一首诗歌，名叫《教室》，刊登在当时的《四川工人日报》上。

因此，那时的作者，对稿笺和信封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因为它是把稿子送到报刊杂志编辑手里的必备工具。当时遂宁县文化馆为了鼓励作者积极创作，有时会用稿笺和信封作为对作者的奖励，作者也对稿笺和信封情有独钟，十分珍惜。抄写作品时都必须小心翼翼，害怕抄错，浪费一页稿笺纸。

那些年代，寄一封普通的信，只要不超过 20 克，8 分钱的邮票可以寄走。而投寄一封稿件到报刊杂志，不超重 20 克的话，3 分钱的邮票可以寄走，但有邮电局却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必须在信封上写上“稿件”二字，还必须剪去信封的一个角，以便让邮局的人在检查时看得见里面确实是稿件。

我的用信封、贴邮票投寄出去，并刊登在公开出版刊物的是一首诗歌，名叫《教室》，刊登在当时的《四川工人日报》上。

用信封、贴邮票投寄稿件，这是常用的投稿方式，除了这种方式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不用贴邮票，也就是不用付邮资的方式。全国有些有名的大型报刊杂志，如当时的《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等等，投稿就不需要作者付邮资。按规定，只要作者在投递的信封上写上四个字“邮资总付”，直接写好信封，投进邮箱就行了，邮局自然会把稿件送到你投递的报刊杂志，投递费用直接由收信的报刊杂志统一支付了。我有一首诗歌不用贴邮票，写“邮资总付”投寄出去的诗歌是《万年青》，那是 80 年代，投给《四川日报》文学副刊，不久便刊登了。

那时信封的样式很多。有小的，只供寄书信和稿件的；也有大的，可以装下16开本杂志的。从颜色上看，有白色的，也有黄色牛皮纸做成的。还有一种信封多数是单位自己印制的，寄信单位的名字已经印在了信封下面，包括电话号码。

这种用信封投递稿件的方式，不知道持续了多少年，我也说不清楚具体时间，只觉得它在慢慢地淡出我们的生活，让稿笺和信封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沉睡，逐渐成为我们的一种记忆，或者回味。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事物，新的科技，新的艺术大量汇成潮流，涌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作者投稿也一样，再也不用稿笺和信封了，也更不用贴邮票付邮资了。

不知是谁发明了电子邮件 electronic mail，简称 E-mail，其标志:@，也被大家昵称为“伊妹儿”。

这种无信封和纸质的传送方式，很快被人们认可和接受。因为这种传递方式，打破了传统传送方式的繁琐，耗时长等许多不便和无奈

“伊妹儿”能以非常快速的方式，几秒钟之内可以发送到世界上任何你指定的目的地，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网络用户联系。这些电子邮件可以是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邮件。同时，用户也可以收到大量免费的新邮件。

现在的许多报刊杂志，直接在征稿信息中明确提出，收稿只收电子邮件，不再收纸质稿件。

这种邮寄方式，也为我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更多便捷，作品完成后，马上就可以通过邮箱投递，瞬间就可以送到编辑的手中，很快让编辑审阅。大大缩短了时间。

由于投稿方式的简便和快速，使得我的作品不仅可以走向更多的报刊杂志，而且还可以走向更远的地方。

实行电子邮箱投递稿件以来，我写的作品，不仅全国几百家报刊发表，而且还在国外的华文报刊发表，如美国的《华文时报》、加拿大的《海外诗刊》、苏里南共和国的《中华日报》、澳大利亚的《当代汉诗》、香港的《新文学》、台湾的《文创达人志》文学、《葡萄园诗刊》等等。我的诗歌《石头》2005年被台湾北立一女中选人考题。这些收获，都有电子邮箱带来的便利和快捷有关。

值得我留恋的，在众多用电子邮箱投递的稿件中，我有一首诗歌叫《三十米大街》是专门写安居，为参加 2018 年安居区总工会开展“爱安居·爱家乡”主题征文而写的，这首诗歌是这样的：

### 三十米大街

在老城挤出来的那身汗水

被三十米大街的风

吹散。我重新舒了一口气

挺了挺身，提了提衣衫

决意要气派地

在这大街走上一遍

以往的日子，多是侧身而过

多是摩擦刮碰

现在，三十米大街

它像一个豪爽的人，大张双臂

激情地拥抱今天和未来

摊开宽阔、平坦，无遮无挡

阳光也忍不住过来

为它铺上金色的地毯

汽车都呼啸而过

连人们的思维、眼界

再也不是那细小的掌纹线

比三十米还宽还长，还具有

豪爽感。因此

我常常用三十米作为标尺

衡量成功与圆满

也常常满足，从街的这一头

踱步到街的那一端

这首诗歌获得了征文二等奖，我把这首诗投给了公开发行的《延河》杂志，很快在 2018 年 8 期发表了。据我了解，到目前为止，写安居的诗歌，还没有谁在公开发行的刊物发表，我这一首是第一次。

我觉得：把信封和旧的邮寄当作一级台阶的话，那么今天电子邮箱的传送方式，就该是另一级台阶。明天会不会有更先进的传递方式把今天的电子邮箱代替呢？我不敢断言，但我相信，时代在飞速地发展，新的代替旧的，这是必然。

谭清友：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在《诗刊》《儿童文学》《星星》《上海诗人》《诗林》《诗潮》《四川文学》《河北文学》《山东文学》以及美国、加拿大、苏里南共和国、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报刊发表诗歌、儿童文学千余首（篇）。诗歌《石头》曾被台湾北立一女中选人考题。出版有作品集 9 本。有诗歌多次获《诗刊》等全国诗歌大赛奖。

